

国是

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政治学？

为祖国培养好公民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兼论《法的精神》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

2013年11月

vol. **11**

国是

卷首语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 胡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创一流国院、育一等英才的征程随时钟咄咄已走过十载岁月。这短暂而又重要的十年，见证并将砥砺国院继续前行。“改革、发展、传承”既是国院的社会责任，也是国院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改革”。随着新世纪现代化步伐的纵深拓展和全球化的迅速扩张，国际环境、国家安全、政府管理、社会互动和政党政治等将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研究和探讨需要诸多学科的交叉配合。鉴于此，着力建设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这样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发展”。年轻的国院已成为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的重要阵地，也将在未来成为学人荟萃、学术繁荣的摇篮和圣地。海纳百川、不拘一格的人才方略，使五湖四海、大江南北、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汇聚国院，跨学科、多元化的先天优势和积极性、创造性的主观努力，让国院学术研究深得海内外学界的赞誉。

“传承”。流水经年，抚今追昔，十年锋锐，始现寒芒。十年，既是国院发展的丰碑，更是国院迈向未来、再铸辉煌的起点。然而，瞻望未来，国院任务仍十分艰巨，道路还相当漫长。在此历史节点，不畏时光之须臾，不惧路漫漫其修远，国院全体师生更需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抓住历史机遇、直面时代挑战。

“为民族立生命，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国院的立院宗旨，也是国院全体师生共同追求的伟业。我相信，有交大百年积累的学术底蕴，有上海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有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一流国院梦”定能够实现。

【顾问】

胡伟 曹友谊

【名誉主编】

章晓懿 彭勃 谢玮

【主编】

曹军强

【副主编】

顾杰 李锦红 沈巖奕

洪风波

【美术编辑】

孙事达

【编辑】

姚炬 夏梦 王书威

黄抒倡 黄家仁 陈璐

王泱 张红斐 程颖莹

刘文漪 唐韵

目录

洞见

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政治学？
钟杨

1

消怨除戾：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连贯性解读
杨志军

5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
——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为例
张贇

11

治学

为祖国培养好公民
彭勃

22

公共政策与公民生活
郭俊华

25

大学与大学之道
黄琪轩

28

开卷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兼论《法的精神》
胡伟

30

有感

王金平“关说”风波对台湾政局变化的影响
林冈

32

管理主义和组织研究的基础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何以重要
张振洋

34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上海的崛起
吕安哲

36

分享

四年一觉香江梦：我在香港大学求学的日子
陈慧荣

38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生难忘的事
赵鹏飞

40

立学先立德，立行先立身
秦川申

43

趁年轻，多出去走走
金帝

44

前沿

政治学领域前沿梳理

46

公共管理领域前沿梳理

49

成果

国务学院 2013 年度
上半年科研成果汇总（部分）

51

速览

速览

53



有没有所谓的中国政治学？

钟杨¹

摘要：我认为我们现在讨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和及时的题目。政治学作为一个学科在中国恢复已有二三十年，是做个小结和对未来发展做个展望的时候了。本文试图通过讨论比较政治学的逻辑来看“中国政治学本土化”的问题。我认为“中国政治学本土化”不是一个很恰当的命题，很可能导致误解。

关键词：比较政治学；本土化；逻辑

我们大概从未听说中国数学家们讨论数学中国本土化问题，或中国物理学家讨论物理中国本土化问题。为什么？因为两个学科都属于科学的范畴，不牵扯因国家而异的问题。我同时也不太赞同用“中国政治学与世界接轨”这样的词语，因为它比较模糊，“世界”指的是什么？我更倾向用“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这一说法。这一说法的内涵是，在研究中国政治现象时，我们要在理论的框架下，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因果关系，最后再将研究成果上升到理论高度。不能就事论事，只是将政治现象作简单的描述和观察。总之，中国的政治学不能停留在国别研究或地区研究的层面，要上升到比较政治学的层面。

1. 比较政治学的逻辑

尽管自从六十年大以来，比较政治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其它几个政治学专业（如美国政治，国际关系，方法论，公共管理）相比，比较政治专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大的空间。相对其它政治学专业，比较政治学者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就没有共识。有些人认为，比较政治学就是研究本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如在美国，你如果研究任何美

国之外的国家，你就是比较政治学者。这就造成了一个滑稽的现象。你如果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你是比较政治学者。但如果你在中国研究中国问题，你就不是比较政治学者了。如果这样理解比较政治学，那么比较政治学就只是国别或地区研究（country or area study）²。还有一些人认为比较政治不是一个实际研究领域，而只是一种研究方法³。如果这样定义比较政治学的话，那么比较政治学应该是方法论领域的一部份，而不是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而且，比较政治学也不一定是研究其它国家，一个国家之内不同地区之间的比较也是比较政治学。

我不太同意上述两种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和解释。我对比较政治学的定义是，比较政治学是用科学的方法，在社会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对不同国别和地区的政治现象进行系统的因果研究，最后的结论要再回到理论层面。简而言之，比较政治学的逻辑就是亚当·史瓦斯基（Adam Przeworski）和亨利·亨（Henry Teune）所说的，要用理论概念作为变量取代国家的名称和符号（replacing proper names），而时间和地点都应视为潜在的变量⁴。比较政治的原理或逻辑其实与政治学的原理或逻辑是一样的，都是研究和解释差

¹钟杨，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美国肯塔基大学政治学博士

²Arend Lijphart, "The Comparative Method: The Comparable-Cases Strategy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8, No. 2 (July 1975), pp. 158-177; and Lee Sigelman and George C. Gadbois, "Contemporary Comparative Politics: An Inventory and Assessment,"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6, No. 3 (October 1983), pp. 275-305.

³Robert Bates, "The Future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No. 2 (Fall 1998), p. 2.

⁴Adam Przeworski and Henry Teune, *The Logic of Comparative Social Inquiry* (New York: Wiley, 1970), p. 25.



异或不同 (variance)。试想一下, 如果世界上的政治现象和政治行为没有任何差异, 那么就不需要我们做任何研究。正是因为有差异或区别, 才需要解释这些差异和区别, 这正是比较政治的逻辑。从这一角度看, 所有政治学研究都是研究差异, 所以政治学研究从根本上说都是比较政治。

举一个例子, 阿尔蒙德 (Almond) 和维巴 (Verba) 合著的《市民文化》那本书, 通过问卷调查他们发现墨西哥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美国市民文化程度低。一般人就满足这一发现, 认为当然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 或者说美国人文或墨西哥人文化就是这样或那样。但如果你是一个好的比较政治学者, 你就要问为什么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 这里的因果因素在哪里? 通过交叉分析, 阿尔蒙德和维巴发现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关键。也就是说, 同等教育程度的美国人和与同等教育的墨西哥人的市民文化程度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的结论不简单是美国人的市民文化程度要比墨西哥人高, 而是教育程度高的人比教育程度低的人更具有市民文化。这样, 国名 (美国和墨西哥) 就被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取代了, 将来如果有人研究其它国家的市民文化, 他就可以直接用教育程度这一变量。换一个说法, 如果 X 条件存在的话, Y 就会发生。

再举一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例子。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科学的学说, 现在在西方学术界还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学说, 就是因为它追求普世的理论解释, 不因国家而论。马克思主义根本上是通过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研究, 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发生, 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从来不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非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分。列宁和毛泽东为了解释为什么社会主义能在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俄国和中国发生, 我不认为他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他们只是在马克思原来的理论上加入了一些新的条件或变量。在他们加入了新的条件和变量后, 俄国和中国的国名就可以拿掉了。

我们经常说,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和文化, 这些言辞经常被当作解释的终点。但作为社

会科学工作者, 我们不能停留用“国情”“文化”这样的字眼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的政治行为, 我们要解析 (decomposing) “国情”“文化”背后的含义, 将其上升到理论高度。被解释的现象可以不同, 但我们所追求的理论解释应具有普世的价值。比较政治学要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 将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与另外一个国家的政治现象结合起来观察, 得出一个结论。理论概念的层次有从低到高之分。比较过程中, 理论的层次要从低到高。前面讲过, 有些人认为国与国比较就像将苹果与桔子相比, 它们之间有形状和颜色的区别, 因此无可比性。但如果我们将比较的概念层次上升到水果的层面, 它们就有可比性了。又比如, 美国人如果对政府有怨, 他们经常通过找本地的众议员或参议员来申诉。而在中国, 如果老百姓对政府有怨要申, 他们经常用上访的形式, 虽然方式很不同, 但两种行为都属于政治参与的范畴。

2. 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与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

下面我讲以一下比较政治学的逻辑与政治学在中国发展的关系。我在开场白中已经讲过, 我不喜欢用“政治学中国本土化”这样的讲法, 因为这种讲法不科学。根据比较政治学的逻辑, 我认为中国政治学的发展前途在于将中国的字眼去掉, 将中国政治研究与科学接轨, 与政治学理论接轨。我这里要特别讲一下地区 / 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关系。在西方这两者经常被对立起来, 即: 地区 / 国别研究不如比较政治研究科学, 因为地区 / 国别研究过重强调某一地区或国家的特殊性, 而比较政治学研究普遍的规律⁵。应该说, 传统的地区 / 国别研究确实过分强调各个地区国家不同的历史, 文化。其实, 我不否认每个国家和地区有它貌似独特性, 但关键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所谓的独特性。我们是把这些独特性都看成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独一无二的, 还是将它们看成是变量而具有普遍性, 只是国家或地区有度的

⁵ 见 Robert H. Bates,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 in Bernard E. Brown, ed., *Comparative Politics: Not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College Publishers, 2000), pp. 28-32.

区别。前者是传统的非科学的地区/国别研究,而后者是科学的比较政治学。这里要提一下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即:有没有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如果有一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中华民族性,那么这个独特的中国文化或民族性又是什么?都说讲面子是中国的独特文化。但我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发现美国人其实也很讲面子。“面子”一词在英文中最贴切的翻译是“respect”。中国人说“你不给我面子”,在英文中是“you have no respect for me”。其实“面子”也是个度的问题。都说美国的一个文化文化特点是遵纪守法,而中国人这方面很欠缺。但我注意到,绝大多数中国人到美国后都很遵纪守法。我们可以说这些去美国中国人这么快就失去了他们的民族性?美国学者 Steve Chan 曾经根据《世界价值调查》(World Value Survey)比较中国和西方国家。结果,他发现中国人在对独立思考的追求,对民主的追求,和政治宽容度方面不比美国或加拿大差⁶。而且,如果一个人说某某文化是独特的,我怀疑他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他研究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了吗?文化可以不同或不一样,但不同和不一样不能与独特画上等号。文化的不同指的是文化中的某种元素在一个国家/地区多一些,少一些,或分布不一样,而不是没有或只有这一地区/国家才有⁷。

关于中国的独特性,如果看一下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历史,也许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海外中国研究最早叫汉学(Sinology),美国最有名的汉学家是费正清(John Fairbank)。传统汉学研究的角是历史和文化,是典型的国别研究。五十年代以前的传统汉学家,一般都没有受过社会科学训练,他们研究中国的生涯往往是从中国

文化的神秘感开始的。从这一角度出发,他们很容易将中国看成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国家⁸。在汉学家当中有一句话,中国就是中国就是中国(China is China is China)⁹。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与众不同,例外的国家,所以要区别对待。这样研究的结果就不是追求一个普遍的理论解释。

从六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中国问题研究起了一些变化。一九五九年,美国学术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和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成立了“当代中国联合会”(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开始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研究。但当时研究的条件有限。如许多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开始用可找到的中文资料研究新中国政府机构。由于中国大陆没有开放,这些美国学者只能依靠中国官方的宣传材料,所以造成研究结论的偏差¹⁰。也有些学者靠访谈从中国大陆出来的民众来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最近二十几年来,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现在最起码在美国的中国政治学者多数都有社会科学的训练背景,是比较政治学出身,能用科学的方法,与政治学理论相联系做中国政治研究。海外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到中国来做田野调查,蹲点调查已蔚然成风。有些学者也已经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中国公民的政治文化和政治行为。他们从研究中国政治的硬件(即中国的政治制度)到研究中国政治的软件(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国家于社会的关系,政治参与他们)¹¹。有些人的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美国主流的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刊物上,如: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World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⁶ 见 Steve Chan, “Chines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Cautionary Remarks on Cultural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Vol. 13, No. 3 (2008), pp. 225-248.

⁷ 见 Andrew Nathan,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2, No. 4 (November 1993), pp. 931-934.

⁸ See Yang Zhong and Tao Wu, “The ‘China Problem’ in the Eyes of the China Watchers,”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No. 6 (Summer 1994), pp. 61-64.

⁹ Michael Oksenberg, *A Bibliography of Secondary English Language Literature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New York: East Asian Institute, Columbia University, 1970), p. iv.

¹⁰ 见 Harry Harding,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M. E. Sharpe, 1993), p. 19.

¹¹ 见 Nina P. Halpern, “Studies of Chinese Politics”, in David Shambaugh, ed., *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M. E. Sharpe, 1993), pp. 126-131.



和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这反映出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研究正从国别 / 地区政治走向比较政治学，走向科学。

政治学在中国应如何发展？在谈到政治学“本土化”问题时，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要有中国的政治学”，“我们中国要有话语权”，“中国政治学要有自己的理论”，“中国要有中国的说法”等等。我觉得这些说法背后的思维模式不太正确，不利于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就像我前面讲过，我们从没听说过“我们要有中国的物理学”，“化学要有中国自己的理论”等。也就是说，学说不能以国家为单位或当定冠词。如果我们还把政治学当成社会科学来研究，我们就应该尽量将“中国”这一字眼去掉，以带有理论性的概念代替。在完善政治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切忌民族主义情绪或“联合国代表”现象。“联合国代表”现象就是每个国家都要有一个代表，有一个声音。我并不反对我们中国学者提出独特的见解，事实上，只要对某种政治现象的解释有帮助，所有学者的独特见解都应得到鼓励。我很希望我们中国的学者能把好的有独特理论和概念的文章发表在美国的主流政治学期刊，引起共鸣，产生影响。这不是不能做到。六十年代，拉美的依附主义理论就成功地打入了西方的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政治学的一个主要流派和学说。依附理论的主要贡献就是修正了西方现代化理论，加入了现代化进程中外部因素这一变量。比如“关系”这个概念，很多人认为这是中国独特的一个现象。其实这一现象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存在。但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中国人的关系网要比美国人的大两倍¹²。既然“关系”在中国是一个突出的现象，那我们中国学者就应该侧重研究这一现象，将各种关系分门别类，看关系产生的条

件有多少，关系的作用根据什么条件有大有小，建立一个“关系学”。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是中国政治学者对政治学理论的贡献。

再有，我也建议我们的学者不因该忌讳借鉴在西方已经成熟的政治学理论与概念，毕竟政治学在西方已有一百年发展的历史。中国的许多政治现象都曾经在西方发生过，西方学者也已经发明了相关的理论和概念。例如，我们在研究中国“压力型”行政体制时就发现，中国上级政府经常通过用定硬指标（一般是数字）的手段对下面政府施压，完成政策任务。这样做的后果往往是适得其反。比如对地方政府下达经济增长的百分比的指令。这往往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地方政府用政府行为进行大量无效投资，以拉动 GNP 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方的经济发展，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不一定能提高。另外一个可能发生的结果就是，如果地方官员不能达到上级规定的经济发展硬指标，他们很可能编造假数据，这也没达到经济发展的目的。上级政府或官员对下定硬指标的做法在美国也很普遍，叫 benchmarking，也会产生负作用，他们叫 perverse impact。举一个例子。某市政府要加强社会治安，要求该市警察局破案率要达到百分之九十。当然，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任务。为完成这一任务，警察们很可能用刑事逼供的方式，逼犯罪嫌疑人招供。本来警察是保护人民的，但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机关成了迫害人民的工具。我要说的是，如果西方有现成的理论来解释某一种政治现象，我们就不必再重新造车（reinventing wheel）。

中国是一个大国，又处于重大社会变革当中，有许多社会现象可以好好研究，应该是社会科学家的一个理想试验室。政治学在中国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¹² 见 Andrew Nathan, “Is Chinese Culture Distinctiv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52, No. 4 (November 1993), p. 929.

消怨除戾：一种构建和谐社会的连贯性解读

杨志军¹

摘要：十八大报告对于社会管理新格局的阐述比2007年十七大报告增加了“法治保障”环节。从根本上讲，法治是纾解社会矛盾与压力的重要平衡器，是培养公民理性和理性社会的可靠途径，更是一国走向现代民主文明的重要标志。根据发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一家杂货店的“偷窃”故事，我们需要进行情景置换，认真反思当前我国社会的怨戾之气从何而来，反思构建和谐社会、重建美好社会的可能。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的逐利性、社会自治系统不畅及新技术带来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失衡后果，三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相互影响和演化，最终导致怨愤暴戾之气滋生与横生。当前，中国面对传统治理惯性的阻拉力（巨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历史文化的厚重性）和开放社会的前冲力（改革导向的政治诉求、现代文明的重新塑造）的双重作用，迫切需要大力开展现代公民教育，探寻公民参与新机制，转变政府治理模式，从而建立科学执政的长期基础。

关键词：怨戾之气；和谐社会；法治保障；民主文明

胡锦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的第七大部分“加强社会建设”中明确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如果细心比较就会发现，此次党中央对于社会管理新格局的阐述比2007年十七大报告增加了“法治保障”环节。从根本上讲，法治是纾解社会矛盾与压力的重要平衡器，是培养公民理性和理性社会的可靠途径，更是一国走向现代民主文明的重要标志。在社会管理体系中增加法治保障，题中应有之义就是要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中嵌入更多依靠法制依据和法治手段来达成和谐社会的目标。从学术研究的价值来看，新的20字方针将会大大拓展理论界的探究解读视野和空间，大大增强社会实践部门主动创新社会管理格局的能动性，为促进理论与实务的联动响应注入了新的活力，贡献了新的平台。加强社会建设，构建和谐社会，既需要大而化之、振聋发聩、黄钟大吕式的理论主旨阐扬，

同时还应该从中微观层面入手，从社区的田野工作和参与观察开始，按照“bottom to up”的研究路径进行另一种富有启示意义的解读。本文即是根据作者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访学期间，通过切身融入和感受生活的蒙特利尔社区，观察新的域外图景，体验新的域外文化，获得新的域外经验，从而阐明新的域外启示，以支加强社会建设之招，以供构建和谐社会之用。

1. “和谐”之维：从一个社区怨戾消解的域外见闻谈起

从目前广泛的观察来看，社会抱怨与暴戾的来源多种多样，但其集中爆发则是在社区（Community）。按照广义的理解，社区即是人们生活和工作的共同体。所以，观察和思考人们生活的泛环境之内各种内在主体对象的交互行为以及作为公平正义主体的主持之道，便是省思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域外经验的直接切入口，是思考

¹ 杨志军，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和谐的重要理据。

这个获得性的素材来源于笔者生活的社区，发生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Chemin Queen Mary 街上的一间杂货店²。这里的杂货店以卖蔬菜水果、啤酒饮料为主，多为华人和印度人所开。某日晚上，一家杂货店中来了三位顾客，一男两女。一女站立柜台前与收银的印度籍女老板攀谈，询问商品价格和属地等详情；另一女子站在店中装货清样的华人小工附近挡住其可观察顾客的视线；一男则径直走到啤酒货柜栏处，观察情势均无大碍、妥当极致时，抱起一打小罐型啤酒塞入宽大的衣服中。顿时，啤酒肚非常明显地出现。但在老板被挡住视线、注意力转移的情况下，此男成功出店，随后两名女子一起离开。女老板好像觉得有些蹊跷，身处店后的华人小工更是觉得可疑，于是打开监控录像，果不其然，此男为一小贼耳。报警后，警察到来，但只能看到其图像，要在短时间内找到此男子非常之困难。当向在店门前喝酒的本地汉子询问是否见过此男时，其中一人告诉警察和店主，此人就住附近，为一无业游民，并知晓其所住公寓。随后，警察赶到住所，夺门而入，该男正在对酒当歌，豪饮爽乎。警察将他逮捕后，带到店内向店主道歉。小偷满脸堆笑，伸出手来想和老板握手言和，老板置之不理，对警察说：“这人永远不能再迈进我的店中，我不欢迎他。”警察听后，对小偷说：“你听到没有？以后你永远不能再踏进这家店中，这就是对你的教训和惩罚。”小偷点头答应，并偿还了酒钱，退还了剩余的啤酒。第二日，小偷在门外徘徊顿足良久，终于鼓足勇气，探进头来，冲店主莞尔一笑，轻声地说：“嗨，我能进来买一点东西吗？”店主一口回绝：No。男子无奈地知趣离开，从此再也没有进过该店。

一个记录在案已无任何翻身出头之日的偷窃惯犯，一个严肃认真讲究原则的店主，小偷和店主的故事扣人心弦，但也简单无奇。当恶行与法治相遇，当程序正义与手下留情碰撞，结果却是以小偷的职业阿 Q 精神和让人闷声发笑的喜剧效果收场。法治中的裁量、差异中的和谐在此事件

中得到了相安其所、各行其道的体现。如若转换情景剧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国内，其结果无外乎以下三种情况：1. 一打小罐啤酒乃小事一桩，店主不予追究，息事宁人，不了了之；2. 店主打电话报警，但附近派出所事务繁忙，无暇顾及此类小偷小摸之事，久拖不决；3. 警察抓到该惯犯，带到派出所，一番盘查，录下口供甚至暴打，而后令其交上保证金，释放回家。

近年来，我国社会怨戾之气顿然增多，大众往往容易将心中的怨气转化成社会的戾气，屡见不鲜的飞车抢劫、血溅现场的情景，层出不穷的公开和公众场合“全武行”场面，历历在目的群体性抗争事件，就是人们将心中愤怒情绪发泄释放出来从而演变成整个社会层面戾气的主要表现。对此，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其中的怨戾之气从何而来，反思构建和谐社会、重建美好社会的可能。

2. 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怨戾之气从何而来？

一般来讲，有怨才有戾，怨气的产生既有社会不公、环境不支、司法不力、公权滥用等因素的直接作用，也与国家内部区域文化的差异密切相关。不管是哪一种怨戾之气，呼进呼出的是空气自不必说，但当气体经过大脑皮层和身体机能的有效运转之后，转化出来的有可能就是怨气、戾气甚至是毒气。这样的情况要么是呼吸之气较为浑浊，要么是呼吸系统较为紊乱，要么呼出之时条件较为恶劣，相对应的分别是市场经济理性经济人的逐利性、社会自治系统不畅及新技术带来的国家与社会治理失衡后果，三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相互影响和演化，最终导致怨愤暴戾之气滋生与横生。

（一）市场体制失效

在以盈利增长目标的市场经济“理性人”假设条件下，一心一意向“钱”看不仅是市场繁荣、

² 由于故事本身的简易，也为了使叙述更加直观有力，在此没有过多的理论解读和交叉分析，也没有对故事中的具体人物化名处理和详细说明，这符合故事与文本的融合样式。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为避免种族歧视之嫌，没有对杂货店的三位顾客“一男两女”的肤色作出说明，尽管这也是考察社会和谐的重要维度。

财富增长、生活改善、福利增进的发动机，而且也是制度变迁诱因的强烈后果。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快速增长，总量不断攀升，财富不断增加。政府正在从投资建设匮乏型向基建消费引导充盈型转变，企业正在从原始资本积累向增量资本拓展迈进，利益集团正在从集束性行业的垄断向国家政策的利益输送传递，大众正在从自给自足的生产生活向逐渐富裕的小康生活过渡，全社会正弥漫着一阵追逐金钱、地位、名望的功利之风，同样，权贵阶层也正在暗涌着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透露出来的“革命总是在改革最明显、进步最快速的时期产生”的警世性恐慌。与此同时，转轨时期的体制约束力日益下降，具体表现在：国家政策被利益集团绑架，司法公平进程迟缓不前，分配机制改革效果不彰，权力监督形同虚设，致使公共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道路举步维艰，公民权利制度化保障机制日益式微，贫富差距越拉越大，阶层分化日益明显，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挫。换言之，以权力的高调宣扬为导向，以有钱能办事的思维逻辑为基础，以正统价值观失音和普世价值观的禁言为工具，最终只会进一步造成人性的肆虐膨胀，加剧社会的不平等。

（二）社会自治功能与公民理性精神无法互嵌

一个国家必须有本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结合并交融产生的公民精神，这种精神应该既有儒家的宽容仁慈谦让的大道大德，又有严谨的秩序观念和权利表达的主动意识。传统道德不可或缺，现代文明价值观也不可少。时至今日，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所描述的第三世界转型国家政党、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嵌入自主性（Embedded Autonomy）³ 格局依然存在，民众怨戾之气的外部环境得不到真正的改善。严格意义上讲，没有赋权于公民的自治实践行动，没有大力倡导理性公民精神的平台建设，没有激活传统媒体和释放禁锢新型社会媒体力量的多元融入，就不可能形

成群体小自治的土壤，也不会产生社会大共治的局面，更不会有社会自治实现后通过系统的自治功能反哺和嵌入公民领域，进行再次培育而后顺畅生长的良性循环格局。就像山川河流之势出于高地、注入良田、泄于低洼、归于大海、复而往始、不曾停留一样，基于安全生存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而进行的改造，也必当遵循如水流之势、气、德。忽略滔滔东去之势，便与潮流而逆；忽略天地七星九泉上下对应之气，便与自然规律相悖；忽视开发建设与人间义理的大德环转，则会得不偿失，失道寡助。因此，怨戾之气盖因于社会自治功能与公民理性精神无法互嵌而致使势气德阻滞不通。

（三）信息技术变革导致国家与社会治理失衡

迅猛发展的信息技术拉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距离，但是技术却不能自动消解社会矛盾。技术带来的信息透明与共享反倒给政府增添了不少的麻烦，社会怨戾之气很难依靠技术的进步而得到顺利解决。因此，当政府治理“平衡术”的难题与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迁不期而遇时，我们应该怎样来思考“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样宏大且显著的命题？我们又应该怎样来探知社会经济结构在大变动中所生产的“潘多拉魔盒”？波兰尼的理论告诉我们，社会怨戾之气来自于国家和社会双向运动失衡的偏颇后果。社会大众除了在虚拟的社区和空间进行情绪表达和议题建构之外，在现实生活空间里很少也很难有关于真正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切身了解政府决策执行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全方位服务、重建基本文明价值规范等议题的实质性促进。这种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失衡及网络社会的“集体无意识”、“群体极化”、“沉默螺旋桨”及“首因效应”导致怨戾之气的滋生与增生。

³Peter Evans, *Predatory, Developmental and Other Apparatuse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hird World State*, *Sociological Forum*, Vol. 4, No. 4, 1989, pp. 561-582.



3. 构建和谐社会： 社会怨戾之气如何消解？

有怨有暴，怨气未到；怨气一到，暴戾就到。民众的抱怨之气和暴戾之气互为表里，交织响应，相互推动。要消除暴戾行为，必须阻隔产生怨愤之气的土壤，必须切割暴戾的管道。笔者以为，以域外经验来看，结合我国国情和社情民意，从现在起，亟需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一）将传统与现代共生共融

笔者生活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每日走出 Snowdon 地铁站后还需步行 15 分钟左右返回位于 Dufferin 的住所，中间要过 5 个街口。值得一提的是，这里通常设置红黄绿白四种颜色的交通信号灯，其中白灯和绿灯均为行人准备，除此以外，一些路口还在路灯的灯杆上设置了手动按钮，优先保障行人过路权利。最让人感动的是，每次经过未设交通信号灯的十字路口（crossroad），只要看到我有跃跃欲试想要穿越马路的冲动，驾车者会很快减速，主动为我让道放行。这种路人先行的社会文明理念已经深深地植入当地人的意识之中，我们很难想象这是国家先发性、种族优越性和文明先进性的结果。相反，这种文明的行为恰恰是现代公民教育结下的殷硕果实。

梁启超在百年前就大声疾呼，“少年强则国强，少年富则国富”。今日，国民教育仍然未见青少年所应得之教义，仍未显青少年所应壮之思想。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只带来了民众身躯的横纵发展，未带来公民精神的培育和公民道德的普及。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的一整套成熟的公民教育体系旨在培养人格健全、价值明确、思维理性的现代公民；东亚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开始启动义务性的公民教育，大力倡导本国的民族特性；韩国早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前后就开始着手进行公民教育的改造活动；新

加坡则将儒家的基本精神植入教育体系之中，把“仁、智、勇、义、礼、信”确定为《好公民》教材和中学《儒家伦理》课的重要内容，台湾亦有这样的传统。

笔者以为，判断一个国家公民的文明程度和世界观水平，不在于是否要求公民爱国不爱国或者有多么的爱国，爱国是公民教育的结果而不是起点。最根本的标准要看在本国成长和培育出来的公民是否具备通阔的世界交往知识和全面理性表达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单向的（爱）党（爱）国主义教育能够培育出来的。因此，面对基于城邦政治实践、天赋人权、新教伦理和自由市场所发展出来的西方价值观，面对 21 世纪如何从深层次思考中国作为大国崛起中的软实力内涵，现在应该是到了充分发掘儒家伦理和道德资源，将普世与本土结合、现代与传统交融的时候了！到了向新一代开放、多元却又迷茫和失准的公民进行现代公民教育的时候了！更是到了向传统官僚结构束缚和苏联式计划教育体系模式说再见的时候了！笔者大力坚持并强烈呼吁，以真正的现代公民教育为开端，宣扬中华民族儒家传统价值观，还原世界历史地理政治知识的本质，普及主流文明的内在规范和价值，传授信仰自由对于人性解放的规范与引领意义，才是实现习近平同志提出的“中国梦”的根本之途，舍此无它。如此，以少带老，以小促大，以滚雪球式的层层递进方式来促进全社会价值观念的成熟，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方能培养出一批世界公民。

（二）探寻公民参与新机制

现在我国政府治理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来源于互联网的开放、便捷、去中心化和弥散化所带来的信息透明和失序并存的交织特点。当代中国政府治理的根本矛盾存在于强势行政主体职责同构和异体同位型的社会矛盾无法制度化解决的困境之中。政府采取运动式治理模式实行 regulatory

⁴ 笔者曾在多篇学术论文中对此予以探讨，请参见：杨志军：《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第16-24页；杨志军：《当代中国“交越式”政治与行政形态的诠释与构建》，载《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9期；杨志军，彭勃：《有限否定与类型化承认：评判运动式治理的价值取向》，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governance 最终只会陷入消防员和救火队长的角色扮演，促使社会矛盾弥散化体现和议题集中型爆发成为一种常态。这种常态化的病态征兆不是社会肌体本身的溃烂，而是由政府行政主体统包大揽、原发高阶的权力集束性膨胀导致。⁴

消解全社会怨戾之气、解决频发社会矛盾的科学有效办法就是开拓新的公民参与机制。美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进行的“伟大社会”改革，就是面对国内种族、阶层之间富裕与贫穷的矛盾，建立一种新的公民参与机制来实现国家的再生发展。面对复杂多变的公共管理现实，公民参与成为政府公共管理部门决策时必须考量的因素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讨论 yes 或者 no 的问题，公民如何参与、何时参与以及怎样评价公民参与行动的有效性才是理论与实践部门应该回应的主题。当代公民参与理论告诉我们，富有积极能动精神的公民绝不仅仅是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消极消费者，还是表达自身利益、影响公共政策的有生力量，更是与公共管理者一起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合作伙伴。

在转型国家政治参与“爆炸”面前，或许约翰·克莱顿·托马斯（John Clayton Thomas）基于提高现代公共管理系统再造能力而设想公民参与新途径之“分散式公民协商决策”途径给予我们诸多启示。分散式的公民协商决策的核心思想：强调在保证公共管理机构政策质量和问题的结构化条件下，管理者必须将有序参与作为政府治理合法性与效能性的基石，通过分别与不同的公民团体探讨问题的方式限制公民影响力发挥作用的空间，并设法与持不同意见的公民达成某种程度的一致。⁵被普遍采用的公共决策方式除了为人所熟知并且常见的关键公众接触（key contacts）、公民大会（public meetings）、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s）和公民调查（citizen surveys）外，社会媒体（social media）的兴起也带来了新型的虚拟社区集群化的参与方式。这些参与方式尽管存在政治法律制度和地域文化思维的差异，但是其旨在释缓表达冲动和参与爆炸的压力机理却是无国界限制的。只有通过开展公民参与的实践，才能真正释放久藏公民心头的怨愤，才能自然培养

公民自治的精神，减缓表达冲动和参与爆炸的压力。

（三）理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针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赶超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凸显导致国家治理失范的状况，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建议应该强化 authoritarian regime 的国家能力建设来吸纳和消解现代化所带来的混乱危机，此种方法得到了王绍光、胡鞍钢等诸多学者的认同，并且也不失为我国国家治理如何落实到政府治理层面的一种有效路径。然而，我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因为国家的弱小而带来不稳定因素，很多时候恰恰是因为国家力量的过于强大，挤压和侵蚀了社会发育成熟的生长空间所致。当然，笔者也并不认同亨廷顿的学生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作出的针对中国的“历史终结论”预设和结论。从世界范围内的转型发展经验来看，一个有理性、讲秩序、懂文明的社会，必然在国家建设层面形成认同，在政府治理层面实现放权，在社会管理层面实现自治，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缺一不可，最终实现个人小自治和社会大共治的良性格局。

因此，首先需要国家将信任的因子赋予社会，社会将信任的种子播撒到公民、媒体、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相互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这样就具备重新找回有共识的凝聚力和出发点。其次，国家建设就是通过国家政权和政府能力建设，优化配置政党统合资源和政府分配资源两个体制上的优越性。尤其是政府要在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实现充分的授权与分权，从而激活民间能量，引导多元主体参与国家建设和政府治理。例如，笔者曾经参与上海浦东塘桥街道的调研活动，直观了解到目前上海的社区绝大部分都采用了社会组织购买政府公共服务的方式来解决本社区的民生和社会难题，并且从世博会召开以来，各大居委会层次都在启动新一轮的美好自治家园建设计划，来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应该说颇有成效。因此，通过基层自治组织来走出一条体制吸

⁴ [美] 约翰·克莱顿·托马斯：《公共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孙柏瑛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9页



纳社会的新路子，是未来社会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消解社会内部矛盾，平息暴戾之气的有效方法。

最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创新要适应开放多元的社会环境。各级政府长期以来倾向于采用运动式治理方式方法，来处理一些影响恶劣、久拖不决、积重难返的社会问题，致使政府合法性遭到严重侵蚀，政党执政基础遭到严重削弱，国家权威受到严重影响。在网络共和国的糟托邦（Dystopian）现实和网络社会风险极其不确定性中，政府单中心的治理活动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地方政府再也不能单凭主观意志和个人好恶来强力推行政策。各级政府要具备和熟练掌握公开与民众对话、交流和协商的能力，通过建立健全一个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安全阀式”的制度通道，与公民保持经常性的通畅互动，才能够从根本上减少矛盾，加强信任，增进共识。这种通过建立公众与行政主体之间相互信任合作的平台的做法，不仅能够形成强烈的社会共同体责任感，达成共担风险的意识，而且在诸多矛盾公开和激化时留存了相当的缓冲地带，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也能留存巨大创新的空间，是建立科学执政长期基础的关键行动。

4. 结语

学术研究需要考虑国家治理变迁的背景，与时才能俱进，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路途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塑造。彼得·埃文斯《嵌入自主性：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的核心观点是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繁荣需要一个深深嵌入社会的有效现代官僚体制⁶；在其主编的《国家与社会共治：发展中的政府与社会资本》一书中，他又着重强调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没有明确的边界，国家制度和公民参与是一个互嵌的过程，通过保持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从而实现共同治理。同样是着眼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米格代尔（Joel S. Migdal）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提出并发展了自己“在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的分析框架（或者说分析路径），强调必须平衡地看待国家和社会在发展中的作用，既要看到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也不能忽视社会对国家的影响，并侧重分析后者的重要性。他在《在社会中的国家：研究国家与社会之间如何转换与互构》一书中，从过程导向路径和人类学的视角，重新思考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国家治理的层级性和现实国家的复杂性决定了二者互动的动态演绎与变迁格局。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强调国家与社会对抗隔离到国家笼罩社会再到回归国家与社会互动的变迁轨迹来看，这些成果较好的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于现实世界特别是转型国家的关注，其实质是不仅要设计出一套高明的猎虎技术，而且还要探索到豢养老虎的方法，实现对“武松打虎”的文明跨越。当前中国面对传统治理惯性的阻拉力（巨型社会治理的复杂性、历史文化的厚重性）和开放社会的前冲力（改革导向的政治诉求、现代文明的重新塑造）的双重作用，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以“势如骑虎”格局来形容这个全球范围内最大的转型试验场，全世界的华人学者令人瞩目，年轻一代学人更是责任重大。

⁶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⁷Peter Evans, ed., *State-Society Synergy: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Development*, Berkeley, California: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 1997.

⁸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U. K.: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⁹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胡国成，赵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56页。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

——以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为例

张 赟¹

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群体性事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影响上都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而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群体性事件在其发生背景、导致因素、演化过程、基本特征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本文以最近发生的广东乌坎事件为例，重点分析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理，以期为正确认识、科学预防和有效处置这一类型的群体性事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群体性事件；发生机理；乌坎事件

近年来，我国各类群体性事件层出不穷，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规模上、影响上都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趋势，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之一。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社会转型期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一定数量的群众参与实施的，采取游行示威、静坐、上访请愿、聚众围堵、冲击、械斗、阻断交通，以及罢工、罢市、罢课等非法手段，对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造成重大负面影响的各种群体行为。²从性质来看，群体性事件一般可分为利益诉求型、社会泄愤型和政治颠覆型三种。本文将以前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为例，重点围绕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深入分析其发生机理，以探求这一类型群体性事件的一般规律。

1. 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我国正经历全面的社会转型时期，快速实现从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经济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现代城

市社会、从传统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经济社会向建立开放经济和全面开放社会的巨大转变。³这种全面的、快速的转型，对我国社会的稳定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一是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推动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7983亿元，按平均汇率折算为58791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也达到29748元（折合4394美元）⁴。二是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转变，规模之大、速度之快、程度之深，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也少有先例。三是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社会群体、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四是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受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观念的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就业选择、利益诉求、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等出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区域、阶层、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明显增加，形成社会共识和社会认

¹ 张赟，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MPA研究生

² 《预防与处置群体性事件党政干部读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7

³ 胡鞍钢等著《转型与稳定——中国如何长治久安》，人民出版社，2005：102

⁴ 《新发展 新跨越 新篇章——“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一》，国家统计局网站 (http://www.stats.gov.cn/tjfx/ztfx/sywcj/t201110301_402706119.htm)



同的难度加大。

“现代性产生稳定，但现代化却会引起不稳定。”⁵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 GDP 从 1000 美元增长到 12000 美元的时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最重要的转型时期，既是经济转型的阵痛期，也是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和政治风险的高发期，极易出现经济增长乏力、贫富差距扩大、阶层分化加剧、社会治安恶化、政治诉求高涨等现象。⁶ 当前，我国正处于这一关键的转型阶段，社会分化的烈度、速度、深度和广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深刻得多，因此也充满了各种困难和挑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那样，“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可能更复杂、更突出。”⁷ 目前，我国社会虽然总体稳定，但也不可否认社会矛盾大量积聚、社会稳定性差已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显著特征。社会转型是当前我国大量社会问题、社会矛盾产生、积聚、激化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研究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宏观国情背景。

具体到乌坎事件所在的广东，虽然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由一个落后的农业省份跃升为经济实力居全国前列、民生社会事业全面进步、体制机制富有活力的较发达省份，但依然具有明显的转型期特征。突出表现在：发展方式总体粗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科技创新能力不强，提高发展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的要求日益紧迫；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贫富差距仍然较大，发展普惠型民生福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任务更加繁重；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新一代异地务工人员融入城市的诉求更加强烈，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和主流文化建设滞后，凝聚社会共识面临新考验，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面临新挑战，文化软实力亟待增强；市场化改革不到位、不彻底、

不规范，与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同时并存，转变政府职能的问题仍然突出；党的建设还不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全面提高党员素质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任务更加艰巨。⁸ 而陆丰更是广东的一个经济薄弱地区，2011 年其农民人均纯收入为广东省平均水平的 78.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 58.6%。⁹ 这也为乌坎事件这一典型的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提供的土壤。

2. 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成因分析

任何事件的发生都有其内在必然性，群体性事件也不例外。群体性事件的背后既涉及到我国转型期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心理等内在原因，也涉及到某些具体的偶发的外在原因。

（一）经济分配层面：社会利益分化不断加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利益主体和收入分配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但在利益分配机制上却存在着侵害普通劳动者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普遍存在。比如，国民收入过多倾向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过程中比重持续下降，普通劳动者收入长期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没有得到根本扭转，2010 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达 3.23 倍；垄断行业收入明显偏高，行业间收入差距仍然较大，2009 年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金融业工资是最低的农林牧渔业工资的 4.7 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甚至非法收入大量存在。¹⁰ 从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看，我国已长期处于 0.4 的国际警戒线以上。

⁵ 塞缪尔·亨廷顿著、李盛平译《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41

⁶ 胡鞍钢《“十二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经济参考网（http://jjckb.xinhuanet.com/2011-07/01/content_318951.htm）

⁷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lhdh/2005-06/27/content_9700.htm）

⁸ 广东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南报网（<http://www.njdaily.cn/2012/0509/138496.shtml>）

⁹ 根据广东统计信息网（<http://www.gdstats.gov.cn/default.htm>）相关数据计算

¹⁰ 《从怎么看到怎么办——理论热点面对面·2011》，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1：21

¹¹ 收入分配的持续扩大,使得低收入群体的“相对剥夺感”明显增强,同时催生了大量弱势群体,对社会不满的程度也逐渐加深。特别是近年来,部分基层政府为维护企业利益与增加政府利益,热衷于地方权力与资本的结合,漠视群众的权利要求与利益诉求,甚至将侵害群众利益当做增加企业与政府利益的前提,严重侵害了部分群众的切身利益。事物的运动是由矛盾决定的,群体性事件之所以发生就是因为利益分化导致穷人与富人、地方政府代表的少数人利益与绝大多数人利益产生了严重对立。而一旦发生群体性事件,地方政府又扮演了既是利益占有者,又是矛盾协调者的角色。

乌坎事件就是一起“因集体土地在村民不知情情况下被贩卖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折射出“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宗旨意识丧失,民主意识不强,滥用职权,或者以权谋私、违法违纪的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对涉及土地征用、工程发包、山地出租等重大事项决策搞‘一言堂’、‘家长制’,明目张胆地侵占集体利益,损害群众权益”。¹²事实上,“村民的诉求很简单,而且也合理,就是要求讨回多年来陆续失去的三千多亩土地。据村民反映,在卖地的过程中,他们一不知情,二也没有得到过赔偿。而这些地近年来大幅度升值”。¹³可见,乌坎事件是一起典型的由于利益分配不公、群众利益受到长期损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

(二) 民主法制层面: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健全

所谓利益表达,是一定的利益表达主体,通过一定渠道直接或间接地向利益表达客体反映情况、主张利益,并以一定的方式努力实现其既定目的的政治参与行为。¹⁴利益表达机制,就是保证利益表达顺利进行的一整套制度和方式。当前,我国社会发生的大量群体性事件,绝大多数都是

农民、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损害后,在制度性利益表达和维权途径不畅或受阻的情况下,不得不选择的一种非常化的群体抗争形式。¹⁵因此,利益表达机制不够健全完善,也是造成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高发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主要表现在:一是利益表达渠道不足,二是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当前,我国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主要有两种:选举和信访。选举活动,既是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与要求,也是公民进行表达利益、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途径。我国公民最主要的选举活动是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通过人大代表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但即使是在直接选举的层次上,如乡镇选举等仍大多以变相的间接选举的形式实现,普通老百姓根本无从知晓谁是乡镇的人大代表,遑论县区的人大代表,也就难以实现选民通过人大代表表达主张自身权利的制度设计初衷了。此外还有基层自治组织如村委会的选举,但也有一个较普遍的现象是,在大多数农村,村民对选举漠不关心、毫无兴趣,或在某些利益促使下变成赤裸裸的贿选,形成“穷庙富方丈”、富人治村的局面。¹⁶信访制度是我国特有的利益表达渠道,但已难以适应群众利益诉求不断增长的需要。一方面,一些基层政府对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特别是一些涉及群体利益的带有普遍性的集体信访问题重视不够,处理群众信访问题简单化,不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粗暴对待信访群众,造成矛盾越拖越复杂,群众不满情绪不断累积,进而导致重复上访、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屡屡发生,并极易演变为群体性事件。另一方面,信访工作机制本身也存在问题,特别是有关部门以信访量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工作的一个硬指标,造成基层政府为了达到息访目的,要么以违规超规补偿满足其要求,要么把注意力放在截访堵访上,既耗费了大量成本,损害了党和

¹¹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披露我国“2010年基尼系数略高于2000年的0.412”,而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实际基尼系数已突破0.5

¹² 人民日报2012年01月10日刊发李松《乌坎事件折射出什么》

¹³ 人民网《孙立平教授:乌坎所展示的长治久安之路》(<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99014/16925434.html>)

¹⁴ 张惟英、姚望《当代中国利益表达机制构建研究》,《科学社会主义》2007(6):73

¹⁵ 人民公安报2005年7月13日刊发张兆端《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稳定观》

¹⁶ 何路社《村自治新论》,三农中国网(http://www.snzg.cn/article/2012/0219/article_27475.html)。



政府的形象，也堵塞了群众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机会。正是由于现有利益表达渠道的不足和不畅，直接衍生出大量的非制度化的甚至是非法的利益表达行为，群体性事件就是其中的表现形式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群体性事件就是相关利益群体由于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一种非制度化的甚至是非法的群体利益表达行动。

在乌坎事件中，利益表达渠道不足和不畅的问题也反映得非常充分。一方面，从2009年6月21日开始，村民就因对土地、财务等问题多次上访，但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导致矛盾日积月累，从而直接引发了2011年9月21日400多村民到市政府上访，并伴有部分村民毁坏公私财物并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等违法行为的群体性事件。此外，基层选举问题也是乌坎事件中村民诉求之一。原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和村委会主任陈舜意两人都已71岁，而且连续在同一职务上任职41年；就在村民上访的一周后，两人还分别以高票当选陆丰市人大代表和东海镇人大代表，但村民对他们的当选普遍存有疑问。¹⁷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¹⁸ 可见，这个曾先后两次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乌坎村在村委会等选举中长期存在走过场的情况，没有真正反映村民的真实意愿。

（三）社会管制层面：社会整合控制能力下降

我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带有明显的让利放权、行政主导的特征，其结果就使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而这又与政府作为公众利益代表的角色常常发生矛盾，使其经济

职能、政治职能、社会管理职能出现扭曲，导致政府权威性流失，其对社会的整合控制能力也相应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严重滞后，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如不适应政府在现代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仍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GDP上，而对老百姓迫切需要解决的教育、卫生、治安等民生问题特别是收入差距过大，往往研究不够、解决不力；不适应公民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的日益提升，仍崇尚“人治”、“强权”，动辄压服群众，使官民矛盾日益加剧；不适应社会监督力度和手段的变化，对群众要求扩大信息公开等监督仍采取冷漠敷衍态度；不适应科学决策的要求，决策过程中的不透明，盲目决策、随意决策现象依然广泛存在，一旦最终结果造成群众利益受损，必然导致群众与政府关系的尖锐对立。二是基层政府执政能力不强，管制能力低下。一些基层地方政府执政理念模糊、执政意识淡薄、执政方式落后，直接导致其社会管治能力低下。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长期以来作为政府管治基层社会重要手段的政治动员的效力正在逐渐消失。而基层政府为完成上级分派的各项任务及应付众多的一票否决指标，不得不采用强化政权机器等手段来填补社会动员资源的缺失，基层政府及干部的行为出现强制性趋向，导致一些基层政府工作走形、变味，激化了干群矛盾、官民矛盾。三是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损害政府威信。一些干部群众观念淡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行政行为随意性大，对群众的疾苦和诉求置若罔闻，甚至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失职、渎职，群众有话没处说、有理没处讲、有难没人帮。一些领导执政水平不高、能力不强，滥用手中的权力，遇到社会矛盾和问题不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而是一味靠强制力量压服群众，引起群众强烈不满，导致矛盾激化，最后演变为群体性事件。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逐渐造成了“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社会心理，群众利益受到损害后往往采取越级上访、集体上访甚至采取一些极端的群体行为方式把问题搞大，以期引起

¹⁷ 搜狐网《乌坎事件调查》（<http://news.sohu.com/20111231/n330873432.shtml>）。

¹⁸ 凤凰网《汪洋：乌坎选举无创新 纠正了走过场形式》（http://news.ifeng.com/mainland/special/2012lianghui/content-3/detail_2012_03/05/12977573_0.shtml）

上级领导和媒体的关注，求得问题的解决。

乌坎事件之所以从一起小规模零星上访事件演变成引起国内外关注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地政府执政能力不强、整合控制能力不足。一方面，当地政府未雨绸缪意识不强，对这一持续上访两年多、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隐患敏感性差、重视不够、反应迟钝，更没有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即便在“9·21”事件发生后，汕尾、陆丰两级主要党政官员带有明显的“敌对思维”。在12月9日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汕尾市委书记郑雁雄说：“一些村民的初衷是赢得利益，但采取了错误的做法，出现打砸等犯罪行为。极少数人担心受到法律制裁，后来采用诱骗、造谣、裹挟的手段使村民不要那么快了事”，“境外的某些机构、势力和媒体与乌坎村事件确实有一定关系，把一个村的问题炒得沸沸扬扬，无限放大，已经跟村民的意愿相去很远”。¹⁹在这种对立思维指引下，抓捕村民代表、形成警民对峙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村民诉求还未得到有效回应、根本问题仍未解决的情况下，政府的强制行为无异于火上浇油。另一方面，乌坎村党支部、村委会群众意识淡薄、腐败现象严重。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称：“乌坎事件起源于利益冲突，既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矛盾高发的必然表现，更与当地农村基层工作、基层干部作风问题直接相关。”²⁰任乌坎村党支部书记长达41年之久的薛昌在讲到村里的土地问题时曾公开说过“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不给你就别想拿到”，²¹俨然成为村里的“独裁者”。事后的调查也表明村主要干部存在违纪违法问题，2011年11月1日，东海镇党委对存在违纪问题的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副书记陈舜意予以免职处理，并接受陈舜意辞去村委会主任的申请；11月17日，陆丰市纪委对薛昌和陈舜意进行了立案查处。2012年4月20日，汕尾市陆丰纪委又宣布对原乌坎村党委、村委共8名成员进

行“双规”，表示将严肃查处他们在土地买卖、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违纪行为。²²

（四）公众心理层面：普遍存在不满以及失衡

群体性事件参与者的社会心理活动，在事件发生的整个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众多研究认为，诱发群体性事件的社会心理机制主要有从众心理、去个性化心理、自我表现心理、好奇心与同情心理。从众心理主要是指个人在群体中受到他人表情和动作的暗示，从而使自我的情绪反应更加冲动。去个性化心理主要是指个体在群体中产生了“法不责众”的心理，认为个体处于一个“匿名”的状况，从而失去自我理性，言行上更加冲动和放纵。自我表现心理主要是指某些个体在群体性事件中希望从众人的追随和关注中得到满足，从而显露自己。这些心理确实在群体性事件的酝酿期和暴发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导致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原因是目前大量存在的对社会不满以及心理失衡现象。²³社会转型时期，公众特别是社会下层群众面对社会广泛存在的贫富悬殊、暗箱操作、执法不公、司法腐败、不公平待遇、不公平竞争、强势群体的专横跋扈、弱势群体的孤立无助等现象时，心理必然会极大的冲击和震撼，从而产生对不满和失衡，主要表现在：认为社会是不公正的，而这种不公正直接导致了收入、权力分配、社会地位、资源占用方面的巨大差异；认为弱势群体承担了改革的大部分成本和代价，而改革产生的利益绝大部分都被一小部分人攫取和占有等等。这种社会不满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具有一定的传染性，可以通过一定的载体传播而使相同社会处境者产生共鸣，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种传播的速度、范围更快更广。而当社会不满情绪无法通过制度化渠道得以宣泄

¹⁹ 南方网《汕尾通报“9·21”陆丰乌坎村事件处置结果》（http://news.southcn.com/dishi/shanwei/content/2011-12/09/content_34742612_2.htm）

²⁰ 中国青年报2011年12月22日刊发林洁《广东省工作组进村处置乌坎事件》

²¹ 王占阳《“乌坎转机”是我国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中国改革网（http://www.chinareform.net/special_detail.php?id=796）

²² 所附案例《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情况》及网易《广东汕尾乌坎村8名原村官集体被“双规”》（<http://news.163.com/12/0422/11/7VML5V3T0001124J.html>）。

²³ 张晓亮《群体性事件成因及预防处置对策》，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22—23。



并积累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藉由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具体事件通过非制度化渠道，比如集会、游行、示威、上访等以集体行为形式宣泄出来。从这个角度来说，群体性事件就是一种社会不满情绪的大发泄。乌坎事件就是当地村民对村委会私下变卖土地、村集体账目不清、村干部贪污腐化等一系列问题长期不满并得不到解决的一次集中爆发，而汕尾、陆丰两级政府处理不力，特别是村民薛锦波被抓后死于看守所更使这一事件出现激化，直到省工作组介入，肯定村民主要诉求合理后才趋于缓和。参与此次事件的乌坎村民近1.3万人，涉及7个自然村、78个姓，可见社会不满心理传播的广泛性。此外，乌坎事件中，媒体和网络也起到了扩大事件影响的重要作用。最高峰时，有近百名境外媒体在乌坎村里与境外通信。当地年青村民还制作《乌坎！乌坎！》的视频短片，通过网络供网民下载和观看，向外界表达诉求及寻求网民关注甚至声援；并通过微博等途径向外发布村内集会与选举情况的最新情况。²⁴

（五）文化因素层面：人治传统依然根深蒂固

社会文化是知识、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人类精神的产物，文化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别在某种条件下，对于行为方式的选择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国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既与人们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的不断增强有着密切联系，也与我国长时期处于封建社会，皇权思想和人治传统根深蒂固有着必然的联系。在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往往对基层地方政府不抱希望，而试图通过过激的

行为方式，想方设法扩大事态影响，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以此来引起上层领导直至中央的重视。而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考虑，上层领导也往往是在第一时间赶赴事件发生现场，亲临解决群众的利益诉求，这实际上进一步强化了“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思想观念。人治传统是我国长时期封建社会的思想遗留，而市场经济是一个法治经济，两者显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现实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等司法不公现象的存在，进一步增强了人们依靠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来维权的心理定势。因此，一旦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人们往往不是首先通过法律来寻求解决问题，而是寄希望于找到一个为民做主的官员，或寻求上层政府或中央政府的干预，这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的一个直接原因。

乌坎事件中，村民多次表示不信任地方政府，而在2011年12月15日上午召开的村民大会上，更有村民表示：现在就算是广东省政府的官员也不可信，并要求中央政府介入调查。而在村民对待媒体的态度方面也可见一斑：因看到境外记者能公开报道乌坎事件详情，认为他们的报道可以促进高层了解乌坎事件，所以村民十分乐意借出自家房子让记者休息、暂住，或借用网络供其发稿。²⁵这是典型的希望事态影响扩大，以引起高层关注的表态和做法。此外，12月26日，在听了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于“全省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后，乌坎事件的核心组织者林祖銮说：这一下，我们的怨气可以一口气发出来，真是见着包青天了。²⁶这种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话语也充分反映了乌坎事件的组织者潜意识中所根深蒂固的那种“清官情结”和“权大于法”的思想。

²⁴ 凤凰网《广东副书记谈乌坎事件：高峰时村里有近百境外媒体》（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1_12/27/11597560_0.shtml）等媒体报道

²⁵ 维基百科的《乌坎事件》条目（http://zh.wikipedia.org/zh/%E7%83%8F%E5%9D%8E%E4%BA%8B%E4%BB%B6#cite_note-23#cite_note-23）。本文案例资料尽可能引用官方媒体，但国内对这一事件过程的报道十分有限，因此仍需参考其他媒体，但也作了一定鉴别。比如，此处引用的两条资料中，第一条发生在省工作组尚未介入、而作为组织者之一的薛锦波被抓并意外死于看守所之际，此时官方对于乌坎事件的处理仍以强硬为主，村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增强，事件有激化趋势，因此有如此表态是可能的。至于村民对境外媒体的态度，可与前注“最高峰时，有近百名境外媒体在乌坎村里与境外通信”互相印证。

²⁶ 搜狐网《乌坎事件调查》（<http://news.sohu.com/20111231/n330873432.shtml>）

3. 群体性事件的基本特征分析

所谓特征，是指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具有的区别于其他事件的显著征象和标志。加强特征研究，有助于了解和掌握此类群体性事件的本质特点及其规律。

（一）从参与主体来看：特定的群体性

群体性是指群体性事件的主体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不特定多数人的聚合，具有群体的性质和表现。群体性是对群体性事件外在性状的概括和总结，是群体性事件最重要的外部一般特征。而作为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主体，它是一个与事件所主张的利益诉求直接相关的特定群体，比如在乌坎事件中，其参与主体均为乌坎村民，属“利益相关方”。这是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在参与主体方面显著区别于社会泄愤型群体性事件（比如贵州瓮安事件）等的主要特征之一。所谓特定的群体性，从规模上讲，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事先无法确定，难以用具体数字表述，可能少则十几人，多则成百上千人甚至几千人、上万人乃至更多；从关系来看，群体成员之间可能较为松散，也可能具有紧密的关系，如一个家族或宗族，一个村落或组织，且大多数处于同一社会阶层，地位相似、心理相近、感情相通，其核心是具有共同的利益和诉求。

（二）从行为方式来看：较强的对抗性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大多数是由于利益长期遭受侵犯而得不到解决所引发的，多数表现为集体上访、围攻党政机关、与维护秩序的公安民警对峙等，因此，群体性事件是一种聚众实施的对抗行为。这种对抗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种是热对抗，一种是冷对抗。热对抗更具有暴力性和破坏性，如围堵和冲击党政机关，打伤工作人员，砸坏办公设施；推翻、砸毁、焚烧警车，辱骂、殴打执法民警；武装械斗，造成严重人员

伤亡等，这些都表现出明显的暴力对抗的因素。冷对抗，则主要指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如游行、罢工、罢课、罢市、静坐、请愿等，虽然表现看似平和理性，但也有很强的对抗性。在乌坎事件中，既有暴力的热对抗，如发生打砸、毁坏他人及公共财物，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等行为，并造成警民冲突、形成严重对峙局面；也有相对平和的冷对抗，如多次示威游行、推选“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等。²⁷

（三）从主要诉求来看：明确的目的性

所谓明确的目的性，是指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主体实施群体行为，其主观目的是特定的、明确的，就是主张受到侵害的自身利益的回归。这种利益，可能是经济方面的权益，也可能是政治或其他方面的权益，但在当前，主要体现为经济利益。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中的参与者大多要表达的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要求。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意识普遍觉醒，大家十分重视对利益特别是物质利益的追求，往往把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看作是一个人事业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正是因为利益意识的强化与利益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人们对利益问题更加敏感，对利益受损更加不能容忍，使利益矛盾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中心内容。此类事件双方的矛盾通常表现为群众与政府或群众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在乌坎事件中，虽然参与的村民很多，但诉求十分集中，目的性也十分明确，“就是要求讨回多年来陆续失去的三千多亩土地”，这是乌坎村民的核心利益。

（四）从外在表现来看：极大的突发性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虽然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酝酿形成的，但引发的导火线往往是一个偶然事件，因而表现出很大的突发性。这种突发性主要表现为：一是对于事件是否发生，在什么地点、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发生，以及程度如何等等，人们都很难准确地把握；二是事件爆发后，

²⁷ 所附案例《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情况》



大量分散的利益相关者会迅速聚集，通过群体性行动来表达内在的利益诉求；三是在爆发初期，人们对事件的持续时间、发展过程以及造成最终后果也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乌坎事件的起因就有很强的偶然性：2011年9月21日上午，几个年轻人从陆丰回到乌坎，看到村北两三公里有施工人员和机械在作业，所在地块是碧桂园新区的规划地块。消息传到村里后，村民们奔走相告，几个年轻人甚至拿出大喇叭，在村口吆喝着要将此事查个清楚。当天村民决定到市政府上访，队伍很快成型，走向陆丰市政府。当日下午，村民来到碧桂园地块，将施工的车辆和工具砸毁，之后返回村里将村委会砸掉，赶走了里面的工作人员。²⁸

(五) 从发展过程来看：高度的复杂性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主要表现在：一是发生原因的复杂性，既有历史方面的因素，也有现实方面的因素；既有群体间利益冲突的因素，也有干群关系恶化的因素；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文化的、政治的、法律的、社会的因素；既有国际的因素，也有国内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构成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复杂原因。二是过程发展的复杂性。事件发生后，由于受到某些外界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变化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具体来看，在事件的不同发展阶段，存在着事态不断发展升级的可能；在事件发展的同一阶段，各种不同违法与合法的形态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很难划清合法与非法的界线。三是事件处置的复杂性。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多、情况变化快，往往是少数人的无理要求与多数人的合理要求相互交织，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与多数人的过激行为

相互交织，常常使得事件解决难以当机立断，处置起来非常困难。一旦应对不当，就容易激化矛盾，扩大事态，导致严重后果。乌坎事件的发展过程也是一波三折，持续了近三个月才在省工作组的介入下趋于缓和。

(六) 从社会影响来看：严重的危害性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一是破坏政府形象，影响社会稳定。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政府若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妥善化解和处置，那么不仅政府的形象受到破坏，而且其政治合法性也会受到质疑，公信力会明显下降，直接危及执政基础。此外，群体性事件发生在短时间内必然伴随着社会秩序的混乱，社会规范的破坏，社会稳定将面临严峻考验。二是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形成不良社会示范。群体性事件一旦失控，发生打砸抢烧行为，将直接造成巨大的经济财产损失。地方政府在集中处置事件方面也要花费大量物力财力，若再加上预防和善后工作，可能会对当地的经济发展造成较大的直接影响。更为严重的是，群体性事件一旦发生，其外部负面效应是巨大的，尤其是为以后的群体性事件起到了示范效应，强化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心理暗示，这必将极大地增加社会治理成本。三是为国际上的敌对势力阻碍我国发展带来可乘之机，多了一些影响和制约我国发展的借口。这几个方面在乌坎事件中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其对社会稳定和政府形象的损害自不必说，而且有了这个前车之鉴，其他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难免不受影响步其后尘。至于敌对势力方面，从那么多境外媒体进村驻户方面也可见端倪。

²⁸ 搜狐网《乌坎事件调查》(<http://news.sohu.com/20111231/n330873432.shtml>)

²⁹ 王赐江《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qikan/2012-05-10/41618.html>)

（七）一些新的特征和苗头性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乌坎事件在具备以上基本特征的基础上，还反映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需给予高度关注。一是在群体诉求上趋于复杂化、多样化。村民们的主要诉求除了返还土地这一经济利益层面的因素外也有依法履行村委会选举权的“权利诉求”，甚至在集会时还打出了“反对独裁”、“还我人权”、“打倒贪官”等横幅。二是在发起方式上，组织性和主动性突出。乌坎村民自主推选产生了“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妇女代表联合会”等组织，并捐款筹集活动经费。三是在参与人员上新生代农民成为重要力量。“70后”、“80后”甚至一部分“90后”成为重要参与群体，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见识广阔，对自身权益也更为在意，而且善于运用录音、摄像设备和网络、微博等新媒体记录事实、传播消息。在新的村委会7位成员中，4位是“80后”，一位是“70后”。²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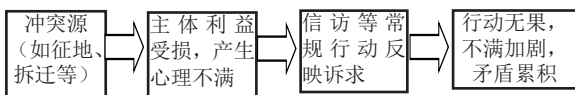
4. 群体性事件的演化过程分析

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从爆发到结束，既有其内在演化逻辑，也有类似生命周期的发展过程，一般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萌芽酝酿阶段：矛盾产生

从表面看来，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都有一定偶然性，但从本质看，其发生之前，大多经历了一个部分群众的合理利益诉求得不到满足、不满情绪得不到疏泄而使矛盾产生并逐渐积累的过程，即萌芽酝酿阶段，其具体逻辑表现为：

如图所示，矛盾产生需要一个冲突源，当前比较多的如征地、动迁、下岗等等，且一般带有



浓厚的政府色彩，即冲突源的主导者是政府或与政府有关。由于这些活动在实施过程中没有利益补偿或利益补偿不能满足部分群体的合理要求，从而使这部分主体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并产生心理不满，而后在部分人员的组织下采取写信、投诉、上访等体制内的常规渠道表达诉求，但由于得不到实质性解决，使他们的心理不满加剧，矛盾日益膨胀。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一些基层政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在面对正常的群体诉求时，常常冷漠回应，不予解决，错失了解决这一类矛盾的最佳时期，为后续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二）集中爆发阶段：矛盾引爆

通过第一阶段矛盾的萌芽和酝酿，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条件已基本成熟，通常只需一个导火索来引爆，使矛盾从相对隐蔽阶段进入集中爆发时期，从而引发各方关注。而这一导火索的发生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如四川汉源事件的导火索是电站的提前截流；湖北石首事件则是厨师的非正常死亡；贵州瓮安事件的诱因是一位少女的溺水死亡；云南孟连事件则是当地公安机关对5名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传唤措施等等。³⁰一旦矛盾引爆，参与主体则会采取如示威游行、呼喊口号、打杂公共设施、与现场维稳人员发生冲突等过激行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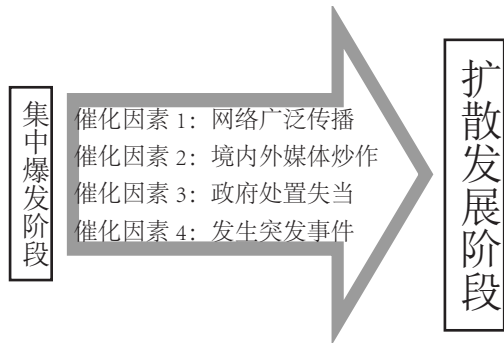
（三）扩散发展阶段：矛盾激化

扩散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影响范围的扩大，包括参与人数的增加、社会关注度的提高等；二是持续时间的延长，主要指事件长期处在僵持阶段，造成久拖不决；三是冲突程度的升级，包括对抗程度加剧、暴力程度增强等。在扩散发展阶段，一般都会有一些催化因素，比如参与者通过网络等媒介广泛传播事件，各类媒体特别是一些境外媒体的大肆宣传报道，处置部门无视群众诉求采取强硬措施导致更大不满和事件反弹，以及发生如个别参与者意外受伤或死亡

³⁰ 根据相关公开资料整理



等突发事件等（如下图）。



(四) 抑制化解阶段：矛盾平息

在这一阶段，由于事件处置部门的妥善处理（一般包括肯定事件参与主体的主要诉求合理，提出双方都能认可的利益补偿或重新配置方案，对于前期事件发生过程中未造成严重后果的过激行为不予追究等），使事件参与群体的要求基本得到满足，从而使事件逐渐平息，矛盾总体得到化解。并通过后续的群众思想工作，进一步巩固事件处置成果，确保不留隐患。

乌坎事件也可以按照以上思路，循其内在演化逻辑划分为四个阶段：³¹

一是萌芽酝酿阶段（2011年9月21日前）：从2009年6月21日开始（事实上，此时矛盾已经生成，只是村民的行动比较理性，使矛盾控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村民就因对土地、财务等问题多次上访，但在两年多的时间内问题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导致矛盾日积月累，处于爆发前夜。

二是集中爆发阶段（2011年9月21日至2011年12月10日）：9月21日，因土地、财务、选举等问题对村干部不满，400多村民到市政府上访，在此过程中部分村民毁坏公私财物并冲击、围困村委会、公安边防派出所。22日上午，又有

一些村民阻挠、打砸进村维持秩序民警和警车。陆丰市、东海镇组成工作组进村做工作，23日村内恢复正常秩序。11月21日上午，又有数百村民聚集到陆丰市政府门口上访，并打出“打倒贪官”、“还我耕地”等标语。12月9日，汕尾市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称已妥善处理“9·21”事件，乌坎村民诉求基本得到解决。当天中午，村民薛锦波等人被刑事拘留。

三是矛盾激化阶段（2011年12月11日至2011年12月19日）：村民薛锦波在被关押了2天后于12月11日意外死亡，从而使事态再度恶化，出现村民与警方在乌坎村口互设关卡、路障等情况，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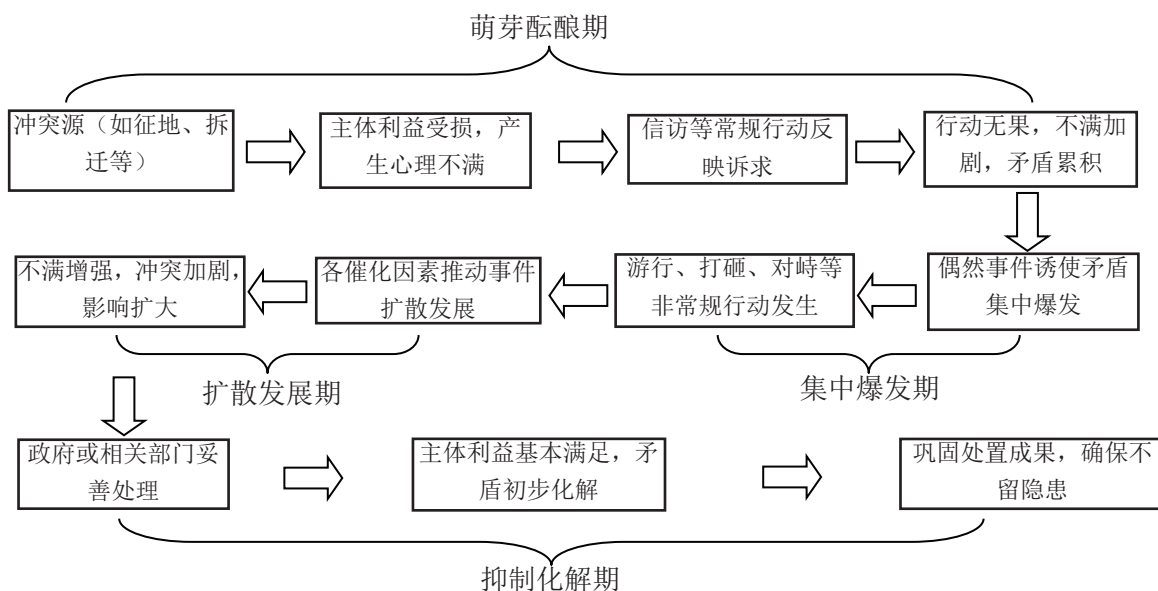
四是缓和平息阶段（2011年12月20日至2012年3月4日）。2011年12月20日，中纪委委员、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带工作组进驻陆丰。当天，村民代表林祖銮等人与朱明国在陆丰市信访接待室会面。会后，林祖銮表示，工作组答应陆续释放3名被捕青年村民，再次确认薛锦波死因并尽快交还遗体，承认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合法身份。随即，村民取消原定于21日的集体上访和游行，并自行拆除村口所有路障。自此，“乌坎事件”走向良性互动。22日下午，朱明国深入乌坎村走访看望群众，受到热烈欢迎。28日，省工作组在乌坎村召开群众通报会，对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换届选举作出整体无效认定，并表示将尽快组织开展村委会重新选举工作。2012年1月15日，乌坎村召开党员大会宣布村党总支成立，林祖銮被任命为党总支书记。2月1日，经无记名投票，乌坎村民推选产生了由11人组成的选举委员会。2月11日，又选出109名村民代表。3月3日，采取不设候选人、本村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产生村委会主任和副主任各1名，党总支书记林祖銮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³¹ 以下四个阶段中关于乌坎事件的材料主要引自王赐江《处置群体性事件需要新思维》（人民论坛网 <http://www.rmlt.com.cn/qikan/2012-05-10/41618.html>）、搜狐网《乌坎事件调查》（<http://news.sohu.com/20111231/n330873432.shtml>）、所附案例《广东省陆丰市乌坎事件情况》以及前文已引用的资料

5. 体性事件发生机理的总结

前文采用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已对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背景、主要成因、基本特征、演化过程等作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这里再作一个简要的概括和小结。从宏观背景看，我国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是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土壤和根源。从主要原因看，一般可从经济分配、民主法制、社会管制、公众心理、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提炼和对照。从基本特征来看，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总体呈现出特定的群体性、较强的对抗性、明确的目的

性、极大的突发性、高度的复杂性和严重的危害性；此外近年来爆发的群体性事件也正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或苗头性的倾向，如诉求多样化（不仅要求经济利益，也要求政治权利）、严密的组织性（事件中一批核心组织人员，并专门建立了相应的工作机制）、主体年轻化（越来越多的“70后”、“80后”甚至“90后”成为事件的重要参与群体）。从演化过程看，一起利益诉求型群体性事件一般可划分为萌芽酝酿期、集中爆发期、扩散发展期、抑制化解期等四个阶段（见下图），不过由于群体性事件千差万别、各有特点，可根据实际情况作一定修正。





彭勃：为祖国培养好公民

人物小传：

彭勃，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访问学者、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太古”高级访问学者，曾在挪威卑尔根大学比较政治系、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欧亚研究中心、香港浸会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系等访学。

从事政治学和公共事务领域的教学和研究，我们经常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们这个专业的老师，到底能教给学生什么呢？我也时常自问。是狮子加狐狸的君王之道？是上下左右逢源的权力之术？还是公务员的中规中矩？现在看来，我觉得政治学者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告诉我们的年轻学生，如何努力当个好公民。

我们现在最需要什么？

我们的祖国文明悠远，风物繁盛，但最缺的是什么呢？各个时期的答案不同。因为最缺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所以就有了“五四”运动的启蒙和社会风潮；因为最缺民族独立与自由，所以就有了抵抗外侮的革命战争；因为最缺平等和正义，所以就有了社会主义的革命；因为最缺财富和发展，所以就有了改革开放。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运欣欣向上，也夹带着扑面而来的积弊和新问题。这些都在告诉我们，国家最缺的是好公民。

什么是公民？

要回答这个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先贤。亚里士多德有一本希腊文巨著，名为《政治学》，这本书为当代政治学奠定了学科基础。令人意外的是，造福广大汉语读者，将这部鸿篇巨制译成中文的，还是一位“交大工科男”。192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机械动力系的学长吴寿彭先生，低调自谦粗通希腊文，却翻译了多部亚氏

的巨著。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与政治绝缘者，“非神即兽”。“凡是参加司法实务和行政管理的人”，都可以称为公民。当然，亚氏所指的公民不是官员，而是在城邦公共事务中具有参与权的人士。古希腊的公民身份具有两个特点，第一，公民只是自然人口的一小部分，女人、外国人、奴隶等都排除在外。第二，公民只是参与小规模的城市公共生活。古罗马时期，公民的视野从小城邦走向大帝国。法律是罗马时代公民观的核心要义。公民依照法律自由行动，有权要求法律的保护。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观，则与人的解放和理性的觉醒联系在一起。人民不再匍匐在国王脚下，而是城市与国家的公民。人们需尊重法律，并有权选择官员。到了现当代，公民观最为强调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但是，由于现代国家的规模巨大、事务庞杂，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变得不现实。这样，人民需要选择自己的代表，由这些代表来议决天下大事。此即代议民主制。由于代议制度中，公民不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公民又往往容易走向消极的政治观，疏离公共事务，退入个人权利的小圈子。

在人类历史上，公民观念随政治环境而演变。但是，也具有一些共同的特质。公民是权利和责任的结合。公民有权参与国家的公共事务，有权选举自己的官员，有权要求保护，免受威胁。当然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伴随着权利而来的是责任。公民有责任关心公共生活，尊重和遵守国家法律。

好公民的德性

关于公民的行为准则，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分别是自由主义思想和共和主义思想。自由主义思想侧重个人权利和选择的自由。公民的行为动机是寻求真正的自我利益。面对国家，公民拥有主权和自决权。同时，公民有义务纳税、守法、敬业，甚至保卫国家。在自由主义看来，公民的最高原则是维护自我的权益。如无必要，不一定会多么积极地介入政治生活。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自由主义的公民观，容易走入非政治化和公共精神的缺失。共和主义的公民思想更为强调人们关注公共事务的政治属性。公民需通过民主参与的渠道，解决公共治理中不公不平等之现象。公民的注意力必须从个人的小圈子，转移到政治共同体的公共事务上来。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公民思想的两条主要线索，公民维护个人权益的个体主义思路，以及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整体主义思路。这两个不同思路的冲突和交织，形成了好公民准则的核心内容。

俗语说，旁观者清。对美国民主制度最精到的分析和诠释，出自一个叫托克维尔的法国人。1831年，托克维尔本来被派去游历和考察美国的刑法和监狱制度，却顺带研究了美国的民主政治，几年后写成的《论美国的民主》，轰动大西洋两岸，跻身世界名著之列。托克维尔的伟大之处，就是在民主政治即将成为世界潮流的19世纪上半叶，就已经敏锐地看到了大众民主的隐忧。大众民主模式下个人理性的张扬，使个人高度自信，缺乏互相信任。权利得到了保障，公民把公共事务的权力全部托付国家。由于国家权力扩张的本性，导致公共权力不断蚕食私人领域。社会个体日益原子化。公民虽然名义上拥有平权，但是在强大国家的面前显得渺小无能。总之，政治有走向“民主的专制”的可能。托克维尔的这种忧虑并非杞人忧天。在后来的西方民主实践中的确存在这种问题。到了二十世纪中后叶，学者们开始意识到参与冷漠将危及民主制度的根基。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出版《独自打保龄球》一书，分析了公民互动缺失和社会资本匮乏所带来的政治挑战。托克维尔早就提出，个人自保和物质主义的思维路径，不应该掩盖人的政治属性和公共追求。公民参与政治的目的，远远不止于个人利益的实现，而是需要在政治领域和公共事务中，体现人性的

追求和张扬介入政治的天然属性。在托克维尔看来，在良性和自由的政治生活中可以培养“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因此，政治的崇高境界，不是个人退避而自保，任由国家坐大，而是在“自由的联合”中实现自我统治和治理。

梁启超曾经说中国人缺德。传统中国乃礼仪之邦，人民温文尔雅，怎么会缺德呢？他说中国人不缺私德，缺的是公德。这里的公德，也许可以表述为公民的德性。公民的德性不同于人的一般德性，它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运转紧密联系在一起。好公民的德性，要求具有强烈的政治共同体认同感。不仅要扫好门前雪，还要管一管他人瓦上霜。所以，好公民会为千万里之外的受灾同胞踊跃救助，好公民会为事不关己的不平之事伸出援手。好公民的德性要求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当理想中的参与途径走不通的时候，好公民不会走向反面，玩世不恭或者极度冷漠，反而会积极地寻求各种实际的，各方可以接受的参与形式。

好公民的理性

前几天，在一个大学游泳池里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八九岁的小男孩，拿着潜水呼吸管，兴冲冲正准备跳到水里，就被管理员制止。小男孩十分不解，反复问为什么不能用？管理员始终只有一个回答，这是规定。小男孩万般委屈和不满，都快哭出来。管理员没有错，的确有这规定。但是，男孩的疑问始终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符合逻辑的答复。也许管理员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他儿童时代也爱问一个为什么，也许有着同样的遭遇。在公共场所，这是一件司空见惯，小得不能再小的事情。但是，这何尝又不是一件大事？遇到事情问一个为什么，这是多么宝贵的思维方式。我们的儿童在学校里，在书本中学习了要独立思考，勤学好问，在严酷的社会生活中一下子就搁了浅。如果成年人的社会里，大家都不问一个为什么，只有说教，不会说理，公民的理性就会无限萎缩，离好公民的目标会渐行渐远。

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就提倡人应当具有启蒙的理性。好公民应当具备理性能力，能够运用自己的思考去判断公共生活中的一切。在民主生活中，如何摆放公民理性和民主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公共事务中的难题，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方式和



政治处理模式。首先是大众民主模式。用民主决策来替代独立思考，将多数决定置于公民理性之上，公民就可以躲在多数人的决策里放弃思考，心安理得。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死表明，与公民大会的投票比较起来，公民独立思考和对真理的追求是多么的重要。其次是精英决策模式。它认为通过多数投票决定的大众民主是靠不住的，仍然要依靠少部分人的理性判断来进行英明决策。但是，谁可以有资格充当精英，也是一个难于解决的问题。所以，就有了协商民主的模式。协商民主的机制是公民通过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而不是通过投票机制一了百了。协商民主可以形成更加优化和认同度更高的决策结果。

公民的重要特征是具备思维的理性。这种理性不仅仅是维护自我利益的本能，更多地表现在能够运用自己的思维能力，分析各种现象的因果关系。公民理性的视野不拘囿于个人的小空间，而会在更大的范围内考虑利益问题。好公民应当会换位思考，会顾及对方利益，甚至会维护看起来没有任何关联的他者的利益。同时，公民的理性并不是绝对和固化的。法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交往理性的理论，认为在沟通和交流之中，个体的理性和意见能够相互碰撞和影响，实现个人理性与公共理性互动。

好公民的策略

现代国家都实现了普选制度。那么是不是只要通过参与各种政治选举，公民就完成了政治义务，实现了政治权利呢？西方民主国家出现一个问题，由于选期制度和影响链条太长，人们发现仅仅通过各种政治选举，还是无法保证有效影响公共政策。因此，在代议民主途径之外，公民有必要直接参与公共事务。

美国学者写了一本名为《走向公民的治理》的著作，提出构建新政府的模式。西方国家曾经

尝试过不同方式，打造一个既能够保证问责，同时又有能力和效率的政府。例如突出专业化和独立性的“韦伯”式政府，以及借用商业组织管理技巧改造政府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后来发现，这些方式都无法逾越的内部瓶颈问题。最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要运用公民的力量来改造政府，使其既保持问责，又维持高效高能。无独有偶，我们国家的政府改革也提出类似的问题。在国家的治理改革中，公众参与和政党领导、政府负责和社会协同并列成为四大支柱。各级政府急需从公民参与中获得治理合法性、政策信息以及各类管理资源。

可以说，公共参与是当前公民行动的有效策略。公共参与也是要讲求方法和技巧，否则会事倍功半，或者欲速而不达。

首先，应当追求适度参与。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和韦巴在《公民文化》一书中做了实证研究，发现最适合现代民主国家的是公民文化，它是一种基于公民理性的中庸政治文化。它不是缺乏任何进取精神的政治冷漠，也不是过度亢奋狂热的参与热情。不一味追求参与深度和范围，而是能够平衡参与热情和政治冷漠，调和权威服从和主动参与。适度参与=，要充分发挥公民的理性。公民应当清楚了解可以影响公共政策的领域和范围，不能不切实际而泛参与化；公民应当了解可以影响政策的深度和各方能够接受的底线。应当适可而止，见好就收。

第二，应当追求合法参与。尊重法律，依法有序参与非常重要。即使法律不完美，执行有瑕疵，钻法律的空子会得到暂时和局部的好处，也要把尊重法律当成一种信仰。应当相信尊重法律，保护法律，最终法律会来保护公民。同时，尊重法律，有序参与也是一种公民的理性。通过合法渠道的有序参与，可以达成可持续的公民参与。能够更加有效地使参与成效固化下来，提升公民影响治理制度的能力。



郭俊华：公共政策与公民生活

人物小传：

郭俊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学博士、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兴趣为公共政策分析、公共部门绩效管理、电子政务，兼任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科技创业研究中心研究员。

我主讲的通识课程《公共政策与公民生活》从2009年立项至今已有三年的时间，在此将些许教学感悟与大家分享。

公共政策课程： 政策何为？价值何在？

许多学生在选择通识课程时都会思考：这门课程对我以后的就业或生活有何益处？一些通识课程看上去跟我的专业毫无关系，我为什么要学习它呢？这些不仅是学生面对通识课程时的困惑，也是当下推行通识教育的困境之一。通识教育——使成为一个完整人格的人。

通识教育旨在培养具有完整人格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其起源于匡正职业化、专门化高等教育的弊端，祛除科学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危害，弥合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的分离。除了早期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所强调的人文精神熏陶、人格完善与修养提升之外，通识教育还非常关注培养学生参与公共事物的能力，而公共政策正是能够彰显这一领域通识价值的课程。

公共政策与公民的生存、发展和幸福息息相关，在住房、医疗、就业等热点话题以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诸多问题背后，公共政策都在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即使身在象牙塔中的大学生也不例外：五花八门的高考加分政策、逐步规范的教育收费政策、众说纷纭的火车票实名制、扶危济困的助学贷款政策、“精打细算”的上海毕业生落户政策……，诸多公共政策都在影响着大学生的生活。正如美国学者米切尔·蒂茨所说，不管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多么守旧，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总是同政府的许多政策与服务联系在一起，

这种联系是挣不脱、割不断的。

哈佛大学在2007年发表的《通识教育小组报告书》中对通识教育的重点进行了重新定位，强调要通过通识教育装备学生积极参与社区性、国家性甚至国际性的公民社会，在“实证推理”类课程下专门列示了“公共政策与政治行为”类的课程。目前国内外高校开设的公共政策类通识课程很多，诸如《公共政策分析》、《民主政治与公共政策发展》、《性别与公共政策》、《社会政策与社会立法》、《公共财政与公共政策》等等。不论给予何种称谓，公共政策通识课程都应从公共政策的基本学理和现实的公共政策出发，帮助学生了解公共政策的相关事项和议题，熟悉当代中国的主要公共政策，增进学生理解政策价值、分析政策问题和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一方面，为同学们作为接受公共政策影响的一般公民做好准备，培养反思与批判的能力，激发他们参与公共政策的兴趣与潜能。另一方面，为将来有志于从事公共事务的同学培养政策方面的基本素养。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 缘何参与？困境何在？

戴维·伊斯顿认为，公共政策可以看成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对某一具体政策而言，这种价值分配将在与政策相关的目标群体范围内进行。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政策过程本质上是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这种博弈既表现在公民与政府之间，也表现在利益诉求不同的公民团体之间。

公共政策过程涵盖了利益表达、利益整合、偏好转换、利益妥协等多个环节，但是不论过程



如何繁杂,都应以公共性为出发点和归宿,这是评判一切公共政策的价值基准。这一性质也决定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意义:既然公共政策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那么没有他们的参与,如何保证公共政策能够代表民意并实现公共利益呢?实际上,公共政策的整个运行过程都以公众为基础,公民不仅是政策需求信息的提供者、公共政策主体的构成要素,也是政策发生作用的基本对象。公民的有效参与,既有利于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公共政策质量的提升和政策的顺利实施,也有利于限制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减少政策上的流弊,还有利于扩大公共政策和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促进公民社会的建设。

公民参与是公共政策的基石,但是要构建如哈贝马斯所设想的公民能够自由参与、交往、对话的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平台,实现公民的有序、理性参与,并非易事。美国学者约翰·托马斯建立了公民参与的有效决策模型,认为政策质量和政策的公民可接受性是影响公民参与的两个核心变量。在接受性要求较高的决策中,公民参与可分为以获取信息为目标的参与,以增进政策接受性为目标的参与和以构建政府与公民间合作关系为目标的参与。由此,公共管理者可以用分散式公众协商、整体式公众协商、公共决策三种决策类型来实现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参与。托马斯模型隐含的前提是负责的政府、积极行动的公民以及存在多样化的社会参与机制,而这些前提在中国并不完全成立。

近年来我国的公民参与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从整体看仍处于较低的发展阶段。在中国的现实语境下,公民参与公共政策仍面临诸多困境,例如:一、公民参与的制度建设滞后,非制度化参与现象普遍存在。现有制度中缺乏规范的参与方式和有效的参与途径,公众表达利益诉求和政策需求的渠道不畅,加上信息不对称、政府回应不足等问题,容易选择非制度化参与渠道,使公共决策的难度和复杂性大大增加。二、公民参与意识和能力不足,导致非理性参与。具体表现在:主动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不强;参与主体的代表性不足;参与的非职业性;参与能力参差不齐,容易出现群体极化现象;缺乏组织性,民间组织自主性程度低等。三、集体行动的高成本与低效率问题。公民参与公共政策是典型的集体行动,即使参与的个体是理性的,也可能产生奥尔森所

说的集体非理性。同传统的政策精英决策模式相比,公民参与会导致信息成本、协调成本等相关成本的增加及决策效率的降低,使政府在民主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权衡上陷入困境。四、传统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我国传统文化中礼治、人治、家天下、官本位等思想对公共政策的影响根深蒂固,一方面,公众对公民角色的认知度不高,政治参与的效能感和满意度较低,容易对参与持冷漠态度。另一方面,政府习惯于替老百姓做主,对公民权利重视不足,担心过多的参与会对政府控制构成威胁。由于害怕承担公众参与失败的风险,以及对技术、效率方面的考虑,政府倾向于限制公民参与的程度。此外,网络环境下的公民参与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挑战,需要深入探讨。

大学生政策参与: 公民意识和公共理性的培育

公民参与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约翰·托马斯认为,无论是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还是在执行中都应最大限度地扩展参与的公民范围;公民参与应落实在各种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具体程序和制度建设上,尽可能发掘和引导可行的公民参与行动,致力于建立和发展各种理性的、有序的公民参与途径,让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真正成为一项集体的行动。要完善公民参与的制度设计、激发公民的参与热情、培育公共理性。对大学生而言,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大学生不是公共政策的旁观者,而是积极的参与者。大学生是未来社会政策参与的重要主体,他们的价值取向、政策认知水平、政策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直接影响到我国公共政策的发展和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大学生思维活跃、富有理想、博学多才,应当拥有更强的公民意识,对自己在公共政策中的角色和责任有清楚的认知,通过政策参与行为增加效能感和满意度。虽然大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较少,但是在招生、就业、创新等政策领域,他们是直接的利益攸关者,理应参与其中。对环境保护、城市规划、生命科学等科技含量较高的政策议题,大学生具有一般公众所没有的专业知识,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参与阶段来看,大学生处于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敏感阶段,对社会和政策现实更有“旁观者清”的优势,不仅是初级的政策关注者,还应努力成

为有见地的分析者、积极的影响者。

第二,注重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精神,提高政策素养和参与能力。针对大学生社会阅历和参与机会不足的限制,采用“以疑启学,以思启学”的思路,选择公务员招录政策、教育不公与政策失衡、高校禁租令等与学生密切相关或容易引发兴趣的热点议题,从问题入手,介绍公共政策的基础知识及应用方法。采用政策专题讲座、案例研讨、情景模拟、政策辩论等多种手段,参研政策内容,透过历史或现代的角度检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政策变迁和政策情境,分析政策困境并探寻完善政策的可能方案。例如:让学生扮演不同的公共政策角色并展开辩论,以了解不同政策主体或客体的决策立场和行为模式,通过不同观点的交锋,体验不同利益诉求和价值偏好直接碰撞的可能结果,以及自由、平等的理性协商的重要意义,培养政策参与所需的责任意识、政策敏感度,以及逻辑思辨、口头表达、利益整合、冲突应对等能力。由于公共政策的跨学科性、时空敏感性和动态发展等特性,政策素养的提升和参与能力的习得并非易事,需要学生在课后通过经典阅读、思维训练、实践参与等方式不断地感悟和积累。

第三,充分利用网络参与渠道,理性参与而不仅仅是情感参与。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大学生的正式参与渠道更为狭窄,但是具有更高的网络普及率和对微博等新媒体的使用率。虽然他们对体制内的动员式参与相对冷漠,但是对利用网

络平台的自发式参与不乏热情,例如:通过网络获取政策信息、讨论热点政策议题、表达意见和诉求,甚至利用网络平台发起现实的参与活动。公众有序参与的重要表现是政策参与活动是在现有制度内的合法行动,作为理性的公民,应当培养遵守法律法规的习惯,对自己政策参与的行为、后果及应付的责任进行理性的审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自由性、无序性等特点,更容易出现非理性行为。面对海量的网络信息,是选择简单地跟贴、转贴,发泄情绪,还是理性分析后再发表意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态度与素养。为此,大学生还应注重媒介素养的提升,培养整合信息碎片的能力、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明辨是非的能力,成为高水平的、负责任的分析者和表达者。只有这样,才能将参与热情转化为理性行动,更有效地实现参与的目的。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随着政治文明建设的推进和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政策价值定位和价值整合的复杂性及难度明显增加,公共政策也面临着适时转型的挑战。在公共政策领域中有许多颇具挑战性的主题,例如:收入不平等、就业困难、社会保障、城市扩张失控等等,即便身为教师也仍有许多困惑未解。要想更好地理解 and 应对纷繁复杂的公共政策系统,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了解、参与、甚至影响公共政策。在交大这样一个理工氛围相对浓厚的学校,这一主题确实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值得我们共同研讨。





黄琪轩：大学与大学之道

人物小传：

黄琪轩，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管理学博士，曾获上海交通大学“烛光奖”一等奖、教学新秀奖等，2010年入选上海市“晨光计划”。

记者：黄老师您好，您曾经在康奈尔求学过一段时间，我们都知道美国高等教育位于世界的前列，您觉得中国为什么会与其产生比较大的差距？

黄琪轩：美国高等教育与国内的差别其实从本科阶段就已开始形成。我在南开读本科的时候，就发现学科之间壁垒森严：学政治学的大多不学经济学，学历史的也不去学数学。这个壁垒现在也普遍。而康奈尔的本科课程设置强调“通识教育”，学生需要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学等几个大门类的课程中，选一定量的课程。然后，再根据兴趣需要，选择一个或两个主修。但是即便是主修，所学的课程并不会太多。而想起我本科学习政治学和经济学专业课的时候，不断从这个教室跑到那个教室，且其中充斥着大量的、无用的、枯燥的课程，好多课程设置是因老师而设置。因此，我不得不一个学期选七八门课，乃至更多。课程尽管多，但是好多课程往往只要去听课，然后背笔记，也能得到好成绩。如此一来，实际学到的东西却很少，根本没有课下阅读时间。而康奈尔本科生一个学期只选3到4门课。但是，他们每门课要求的阅读量很大，这些阅读的材料会体现在期末的考核中。因此，这也迫使学生认真对待这些阅读。在课堂上，学生们在助教的组织下进行讨论，所有学生都有发言机会，从而锻炼了他们的讨论能力。美国的大学从本科就开始的大量阅读和深入讨论，对培养学生的讨论技巧、学术兴趣等都有好处。因此，国内的大本教育和美国好的大学的大本教育确实很不同。康奈尔大本教育的特点就是：课程丰富、课少、读书多、讨论多。

记者：刚才您主要介绍了本科教育的差别，那么在硕士生或博士生方面是否也存在着这样的差异呢？

黄琪轩：在康奈尔，博士招生，各个系会有一个招生委员会，招生属于大家集体决定，是集体领导。这个委员会每年人选都会有所变更，他们根据学生的学术能力和研究兴趣等来筛选学生，学生统一招进来以后，再根据自己的研究兴趣选择一些导师来指导自己的论文。国内博士招生是各个导师决定，刚招进来就定导师。这种做法，除了对导师滥用权力缺乏制衡以外，另外一个弊病就是学生容易被老师的研究兴趣牵着鼻子走。在学生缺乏自身兴趣的前提下，这么被牵着走下去，难以想象能做出精彩的研究。同时，康奈尔对博士生的指导也与国内有很大的不同。国内博士生大都归导师私有，像导师的家属。而在康奈尔则是集体所有，导师都是集体指导，学生可以采众人的精华。如果你要写大国政治与技术变迁的论文，你需要在导师团里选一个国际关系专家，然后选一个技术学专家，然后是国别研究的专家。如果这项研究要做量化，还可以选一个量化的专家。这样，不同老师可以在不同层次和侧面给你提供指导。

记者：感谢您的介绍，请问您在康奈尔求学时留下了哪些比较深刻的印象？

黄琪轩：首先，康奈尔博士生的讨论课，每周课前阅读是300-500页英文。然后大家在课上讨论，教授选择阅读的材料并引导学生讨论。讨论课能

非常好地激发学生创造知识的冲动，不同的学生短兵相接，热闹非凡、互相激荡。只要善于扑捉到讨论课上的亮点，就会是很好的学期论文、学位论文的开端。

还有，选课在自由中又有着一些不自由。康奈尔博士生选课，只要选满 12 门课就好。这个意义上，是自由的。但是，约束是，你要根据自己的研究选。比如你主修国际关系，那么你就需要选 5 门国际关系门类的课，你辅修比较政治学，你选 4 门比较政治学的课。此外，有点更不自由，就是每个人需要选择 3 门方法论的课程。但是虽然方法论课程看似与专业没有联系，但是却为大家讨论问题和研究问题搭建了一个基本的平台。

此外，康奈尔还有综合考试，学生们叫 A 考，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保证专业文献的阅读基础。有的学校给书目，比如普林斯顿政治学系 A 考书目，光列出书名和文章名，就有 50 页之多。有的学校不给，还得学生自己收集。读完去考试，考过了才能做论文。综合考试形式多种多样，康奈尔政府系的政策是：选一个 major，一个 minor。比如我 major 是比较政治学，minor 就可以选国际关系，或者美国政治等。你需要考两门。每门课给学生 72 小时时间，回答三道题。过 A 考是这里博士生的一道坎。但是，却这道坎却可以把好多不适合做研究的博士生再筛选出去，节省了双方的时间。系里老师在每周五下午会组织一个讨论会。每个年级一个组，博士生们都会在讨论会上讲自己的论文。然后，大家提出批评。他们的博士毕业没有发表要求，让你专心打造自己的论文，而不是忙着发表。因为参加 job talk 的时候，大部分需求方是识货的。多放一篇质量低的文章进期刊，反而会影响名誉。此外，这里也不需要匿名评审博士论文。因为，你会跟你几个导师会陆陆续续讨论几年你的论文。这么下来，他们对你研究也算了如指掌。他们让你答辩，其实就是已经让你过了，答辩反而就是走过场。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兼论《法的精神》

作者简介：

胡伟，政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东北亚名人会”中方成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研究专长为比较政治、政策分析、中国政府与政治。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多么观点鲜明而内涵深刻的话语，必将成为中国现时代最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法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规律性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惩治腐败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他还特别强调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多么观点鲜明而内涵深刻的话语，必将成为中国现时代最颠扑不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法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政治规律性的把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意义十分重大。

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句话浓缩了现代政治学的深刻哲理，体现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智慧结晶。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讲到，“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英国19世纪著名的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说过：“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趋于绝对的腐败。”时至今日，这些话早已脍炙人口。无论何种社会，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对权力进行监督制约，都不失为在政治制度层面上克服腐败的根本方法，它虽发轫于西方社会，但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历史上一贯注重的从思想意识领域遏制权力的变异，

如儒家倡导的正心、修身的“内圣外王”之道，专制王朝也企图依靠“君君臣臣”的道统来培养对皇帝效忠的“清官”。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虽然也能从一定程度上约束官员的行为，却无法防止腐败现象的大量滋生。每一封建王朝的倾覆，无不是最终由于政治腐败猖獗不治所致。究其原因，就是不能从政治制度上解决对权力的制约，无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当前中国开展反腐败斗争，进行思想教育是完全必要的，如号召党政领导干部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带头廉洁自律，以及通过重大典型案件对党员干部进行警示教育等等。但单靠这些还不够，必须加强制度建设，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来遏制腐败的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党风和社会风气不正，不是腐败现象的原因，而是腐败现象的结果。因此，治理腐败，关键还是要从政治体制和民主制度上着手。早在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谈到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史上治乱兴衰的周期率时，提出了依靠民主、依靠人民监督政府来防止腐败的思想。那么如何依靠民主呢？如何实现人民的监督呢？实践证明，民主应当通过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安排来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也应当通过制度化的权力制约来实现。

权力监督的必需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

那么，人民赖以监督政府的制度安排是什么呢？如何才能构建一种好的制度把权力关进笼子呢？这当然包括诸多内容，但从宏观上说，正像

现代政治理论和政治经验早已经证明的那样，第一，在权力的纵向配置上，实现治者与被治者的制衡，主要是建立人民同意的政府，这意味着政府应是民选的、受民意支配的、对人民负责的。如果说权力趋于腐败是一条所谓普遍法则的话，那么正如著名政治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克所言，腐败的程度是与权力的同意程度成反比的，这同样是一条普遍法则；第二，在权力的横向配置上，实现不同权力主体的制衡，特别是要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平衡，使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既相互统一，又具有一定的张力，从而以权力制约权力；第三，是在一个新的维度上实现社会权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制衡，特别是通过大众传媒和公共舆论来制约公权和表达人民的呼声。以上构成了一个权力配置的三维空间。上述三维权力配置的结构，不仅是权力监督的必需，也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必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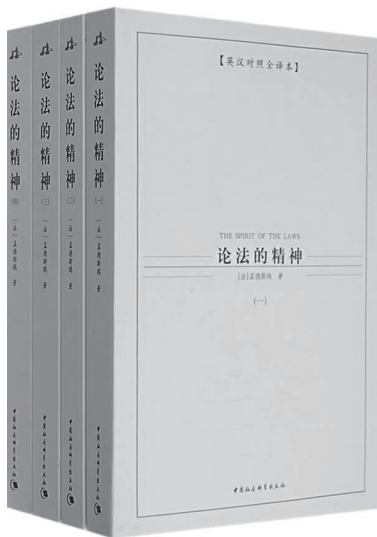
要真正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在我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权威统计，截至2012年7月，党和国家机关及其有关部委制定涉及反腐倡廉的法律法规616项，各省级地方制定涉及反腐倡廉的地方性法规和规定1538件。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反腐倡廉方面出台的规章制度有如此之多，但为什么我们在一些领域还没有真正做到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呢？问题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的不是书面上对领导干部监督的原则和规定，我们缺乏的是行之有效的权力制约的具体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结果是法定的规则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往往只停留在纸上谈兵，而实际运行的经常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官场潜规则”。



制度决不仅仅是书面上规定的东西

时下不少人对于制度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化，把规章等同于制度。实际上，制度决不仅仅是书面上规定的东西，无论是制定了宪章还是法律，都不意味着一种制度的实际确立，正像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所说的：“制度是活的东西，是不轻易而将它们秘密透露给刻板的文字的。”要让制度起作用，除了书面上的规定，更重要的是要进行相应的权力配置，使制度运行具有动力机制，实现以权力制约权力。实际上，这不仅需要权力监督的需要，而且也是民主政治的需要，是实现任何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活的需要。政治学也好，民主政治也好，说到底就是要解决如何科学地配置权力、如何防止权力被滥用、如何以权力制约权力的问题。从消极的意义上说，这是防止权力腐败的问题；而从积极的意义上说，这是整个政治体制必须面对的根本问题，也是良好政治生活的制度基础。这并不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更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问题，而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有鉴于此，要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必须探寻对权力进行监督和制约的新思路和新途径。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包括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完善党务公开、政务公开、司法公开，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等，都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科学之道，关键在于如何加以切实的落实。





王金平“关说”风波对台湾政局变化的影响

作者简介：

林冈，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兴趣包括比较政治、中国政治、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

2013年9月6日台湾政坛爆发国民党籍立法机构负责人王金平为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总召柯建铭进行司法“关说”的新闻后，马英九亲自召开记者会，说明这是“侵犯司法独立最严重的一件事，也是台湾民主法制发展最耻辱的一天”，要求正在马来西亚为女儿举办婚礼的王金平尽快返台说明事情始末。王金平旋即返台召开记者招待会，否认指控，批评检方引以为据的电话监听纪录属于非法监听，表示“不辞职、不退党、不组党、不罢马”。国民党当局随后撤销王金平党籍，并通过“中央选举委员会”函告“立法院”，希望尽快解除王的“立委”身份和“立法院长”职位。王金平坚持“以柔克刚”，一面表示自己是永远的中国国民党党员，一面通过民事诉讼手段，以“假处分”方式继续保留其党员权利，进而维持其在立法机构的职位。一场司法“关说”事件演化为马、王对台湾立法机构主控权的争夺战。在连战、吴伯雄等国民党大佬的居间调停下，国民党当局最终决定放弃对司法系统“假处分”决定的抗告，悄悄收回对王金平撤销党籍的决定，暂时平息了这一场被媒体称之为“九月政争”的党内风波，但其后遗症难以消除，对国民党在2014年和2016年的选情势必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为两岸关系投下不稳定的变数。

政治是非与人情世故的纠葛

王金平司法“关说”案的缘起是柯建铭请托台湾“高检署”检察长陈守煌不要对台湾高等法院对柯所涉及的全民电通背信案改判无罪进行上诉，并委请王金平代为出面，向陈守煌“关说”。

王金平随即向陈“关说”，并与台湾司法机构负责人曾勇夫通电话情。在曾告知王柯案不会上诉后，王又电告了柯建铭。台检方因为监听有案在身的柯建铭的电话，无意间听到了柯、王请托关说的电话内容，导致此案披露于世。作为国民党员，王金平为民进党涉案人士关说，不但有违政党政治的常理，也不符立法与行政、司法的权力分际。这对以清廉自诩的马英九来说，自然难以接受。

但吊诡的是，在国民党作出“大义灭亲”的举动后，台湾民间却充满了对马英九的不满声音，使其支持度下降到9.2%的新低。舆论的焦点很快转移到监听是否合法的问题。王金平的“假处分”申诉，顺利通过台北地方法院和台湾高等法院两道门槛，获得社会同情。其原因一是台湾政坛所长期存在的不良的政治文化，即人治对民主与法治的干扰；二是马、王在个人性格和政治利益上的长期隔阂和冲突。

台湾政治讲究人情，具有东方传统社会的特点。从选举绑桩、扫街拜票、司法关说，到工程发标都可以看到人际关系的影子，以至于“搏感情”成了政治人物的口头禅和护身符。虽然台湾法治和民主选举制度行之有年，但黑金政治的陋习仍难全面革除。在制度的边界模糊的情况下，人们在情、理、法的价值取舍中，首先选择的的可能不是法和理，而是情。就王金平关说事件而言，有人就认为既然柯建铭的电通背信案已经改判无罪，让“高检署”不要继续上诉也没什么大不了；马英九在记者会上要求为女儿操办婚礼的王金平尽速返台说明情况，不符人情。作为国民党内外省籍和本省籍的两位主要政治领导人，马英九亲上火线批王，难免为人留下“外省人的总统”欺

负“本省人的立法院长”的口实。事实上，这一说法在9月初就在台湾南部地下电台广播中广泛流行。这一说法并不合理，但还是会影响到不少台湾民众对马、王是非曲直的判断。

两党三方的政治博弈

台湾2008年实行新的立法机构选举制度后，形成了稳定的两党政治。但国民党内以马英九和王金平为代表的两派政治势力存在已久。王金平代表本土派，游离于马英九团队与民进党之间，左右逢源。这种情况跟国民党在1990年代初一度出现“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之争，有几分相像。当年以李登辉为代表的“主流派”，就是在“非主流派”与民进党的斗争中，寻求其最大利益的。

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后，国民党内以马团队为一方，以王金平和部分“立法委员”和一些地方派系为另一方的矛盾，很快浮上台面。马英九执政团队提出的许多政策法案，在“立法院”无法过关，跟一些国民党籍“立法委员”不配合显然有关。2010年国民党在高雄市长候选人的提名过程中，马英九的亲信赖伟峰和属于高雄“红派”的林益世均未能出线，而由跟王金平关系密切的黄昭顺出线，可见王金平在南部的政治影响力。随着党内2012年“不分区立委”提名的临近，王金平从2010年开始，比较配合马英九行政团队的施政，改善“立法院”的工作效率。随着马、王关系的暂时好转，王金平名列国民党不分区名单的第一名和预定“立法院长”人选。但在2012年马英九连任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国民党在“立法院”维持过半席次后，“马金体制”在立法机构再次运作不畅。“美牛”、“证券所得税”、“油电双涨”、“年金改革”、“服务贸易协议”等政策议案在“立法院”贯彻不力，说明行政团队所欲推行的政策，仍未能得到党籍“立委”的全面配合。王金平“关说”事件爆发后，10多位国民党籍“立委”前往机场迎接王金平，对其情义相挺，展现党内部分人士对马阵营处理方式的不满。

虽然国民党禁止派系公开运作，但始终存在隐性的派系利益争夺，有时还演化为公开的冲突，甚至导致政党分裂。例如1993年新党出走和1996年郝柏村的脱党竞选，2000年宋楚瑜脱党竞选和亲民党的另起炉灶，以及同年李登辉的退党和台

联的成立。就马、王之争而言，马英九身边所集结的人士，属于同好型派系，即由一群在意识形态、政策、物质、个人或其他需求上具有某些共同利益的人所组成的团体，其成员是非正式的、流动的甚至没有组织化。虽然马英九力图摆脱派系政治的影响，相信制度化的党政运作，但其核心团队还是难免由一批跟其具有同质性的人员构成。与此相反，王金平作为出身高雄“白派”的本省籍政要，长期经营“立委”选举和地方政治的运作，为人圆融，其人脉网络类似以利益为导向的侍从型派系结构。王担任“立法院长”至今，与不同党派的政治势力均维持较好的关系，而有所谓“蓝皮绿骨”、“政坛不倒翁”的说法。为此，在这次“关说”风波中，民进党全面“拥王打马”，试图通过“倒阁案”、“弹劾案”和“罢免案”的推动或酝酿，与部分国民党籍“立委”联手对付马英九，进而裂解国民党。但从国民党“立委”全数反对“倒阁案”来看，国民党内最新的这一场权力斗争应不会导致其再次分裂。其主要原因一是以往脱离国民党的政治人物，最后都难成气候，已有前车之鉴；二是2008年立法机构实行单一席位选区为主的选举制度后，基本上杜绝了第三党的生存空间。王金平在撤销党籍后，仍以永远的中国国民党党员自诩，正是基于上述考虑。

对台湾政局的影响

从目前岛内两党三方的政治博弈格局来看，国民党的内部组织结构今后有可能向派系分歧常态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不管是90年代初的“主流派”、“非主流派”之争，还是从1997年开始的李（连）、宋之争，都是以失败的一方离开国民党为告终。如果以王金平为代表的政治势力，得以留在国民党，制衡以马英九为代表的行政系统，是否会改变国民党内部派系的运作模式，由是非之争演化为互争共治，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李登辉在退位前的1997年无法安抚宋楚瑜，陈水扁在2005年后无法摆平党内“四大天王”矛盾一样，马英九在其第二任期的最后几年，也将面临党内不同力量和反对党的更大挑战，增加行政系统的意志在立法系统的贯彻难度。王金平关说风波发生后，国民党当局排除其参加党内高层五人小组定期活动，连战、连胜文父子挺身支持王金平，吴伯雄极力在马、王之间搓和，朱



立伦、郝龙斌、胡志强等人立场不很鲜明。不管国民党最终能否撤换王金平，行政系统的政策议案都难以得到立法机构的全面配合。如果王金平维持院长位置不变，“马鞭”将更难伸进立法机构；即使最终撤换成功，立法机构内的两党冲突也势必加剧，属于王金平系统的“立委”对行政系统的意见可能消极对待，不见得就有利政策的推动。

如果马、王未能化解矛盾，国民党在未来两年的选举中可能面临同党竞争，从而导致脱党参选的风险，对选情带来不稳定的因素。国民党是否在台北市和台中市（除了新北市和未来的桃园

市）都能协调出党内各方都能接受的强棒候选人，进而争取在“六都”市长选举中取得4比2的战绩，是衡量2014年“七合一”选举结果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在2016年选举中，基于马英九及其身边的“同好型”派系人士的行事风格，与王金平维持侍从型派系关系的“立委”能否获得国民党的提名？这些未获提名的现任“立委”有无可能凭借其在单一席位选区的连任优势，与马英九所欣赏的候选人闹“双胞胎”？在2016年“立委”选举中国国民党能否笃定过半？这些都是王金平关说事件所带来的余波，值得密切关注。



管理主义和组织研究的基础

——法约尔的管理理论何以重要

张振洋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

亨利·法约尔（Henri Fayol）是管理思想史上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凝聚其毕生心血的著作《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更是管理思想史上的一部不可多得的名著。法约尔在书中总结了其一生的管理实践，提出了诸如“法约尔跳板”、“十四点原则”等至今仍有着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管理法则，也向世人展示了管理学的技术性和艺术性。由于法约尔的巨大贡献，他被称为“现代经

营管理之父”，更是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的包政教授誉为“一代宗师”。

与同时代的美国管理学家弗里德里克·泰罗（Frederick Taylor）关注于企业管理的操作层面不同，作为总经理的法约尔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关注组织的管理问题，他考虑的是管理对于组织发展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法约尔认为自己所讲述的管理原则不仅适用于大型企业，

也适用于军队、政党、学校等大型组织。因此他将自己的著作命名为《工业管理与一般管理》。

法约尔在管理思想史上第一次将管理从企业众多职能中独立出来,并将其界定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管理存在于组织中的每个环节,在组织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只是其对于不同级别员工的重要性存在差异。因此,每个人都离不开管理职能,每个人都需要掌握管理技能。管理知识不仅可以从一线实践中获得,也可以从学校教授的管理学理论。所以,法约尔首次提出,学校的管理教育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管理学必须首先成为理论,才能在学校里教授。于是,法约尔就尝试建立了自己的理论,那就是管理的“五职能说”和“十四点原则”。

纵观中国行政学说史系列的专著,无论是复旦大学的竺乾威教授,还是武汉大学的丁煌教授,他们都在自己的著作中将法约尔作为古典行政管理的重要人物予以介绍。一个企业管理的大师,为何受到公共行政学界的如此重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得不回顾公共管理的思想史。

公共管理思想史上一直存在着两大基本流派——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管理主义强调政府管理与企业管理的相似性,认为企业管理优于政府管理,政府应该向企业借鉴经验,以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管理效率。然而,宪政主义倾向于把政府管理称为“公共行政”,着重强调政府管理中的“公共”因素,认为政府管理和企业管理虽然同为管理,但是两者的管理存在很大差异。比如,政府管理的制度限制远远多于企业管理,政府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所受到的制度约束远远多于企业管理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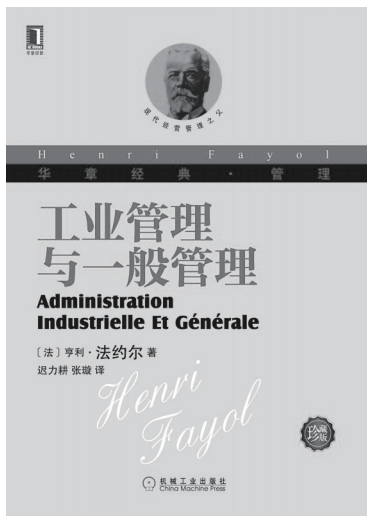
在宪政主义者看来,政府管理就是 administration,该词不仅意味着“管理”,更有“为国家掌舵”的引申含义,意味着政府不仅要管理好自己和国家,另外还要带领公众追求公共利益。管理主义者一般认为政府管理与企业管理具有高度的相似性,management 一词更符合当代公共管理的实际,其“经营”的含义与新公共管理者提升政府效率的初衷不谋而合。他们认为 management 在范围上要广于 administration,management 不仅囊括了 administration 的含义,而且还包括了许多 administration 一词所忽视的含义,比如项目管理、全面质量控制等内容。

因此,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法约尔的一般

管理思想不仅是现代管理思想的起源,也和“泰勒主义”(Taylorism)一起构成了公共管理中“管理主义”的基石。因为前文已经提及,法约尔认为其 administration 理论不仅适用于工业企业,也适用于党政机关和宗教组织等。

最为重要的是,法约尔在公共管理思想史上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他既强调了管理的技术层面,又将管理纳入到了组织框架之内进行研究,将泰勒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联系起来。与马克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遥相呼应,法约尔认为管理应该通过一个讲究层级节制和命令统一的等级制组织来进行,同时,法约尔还考虑到了等级制组织潜在的效率低下问题。因此,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约尔跳板”原则,鼓励下级在得到上级的许可下,协商解决问题。这样不仅提高了效率,还将高层从琐事中解放出来,考虑组织战略性的问题。

不得不提的是,法约尔的“五职能说”对之后的行政管理学者卢瑟·古力克(Luther Gulick)提出的 POSDCORB 七职能说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由此可见,法约尔首倡建立的管理学知识体系和管理学的学科教育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也算是法约尔的一大贡献。





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分析上海的崛起

吕安哲

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硕士研究生

上海崛起与熊彼特的 经济发展理论

(一) 社会经济发展的概念

根据熊彼特的定义，经济发展是一种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一种历史的演变。熊彼得认为历史的状态是不断变化的事实，历史的状态，也因此变化在历史的时间中而成为历史的个体。这样的变化，使得熊彼特对社会发展的概念下一定义，即各种的历史状态能从其先行状态获得适当的理解。

从海滨渔村到近代一跃而成为中国、远东第一大都市的上海，上海在每一个时代都在不断的蜕变，而在每一次的蜕变中，都牵连着历史，例如港口事业的蓬勃发展，成了上海成为全国最大的外汇金融中心、而邻近政治中心，也让上海在效率上更能反映市场。由以上看来，上海的发展绝不是偶然，这么完整的历史背景，造就了今日的上海，也印证了熊彼特对经济发展的最初步的概念。

(二) 实行的经济发展

一个都市的发展需要强大的资金，促使进步和扩大市场。从上海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自从开放外资后，就有大量的外国企业及资金不断涌入。同时，除了先前所说的历史及地理位置的优越条件，上海在外国企业的眼里，甚至是中国人民的眼中，都代表着中国强盛缩影。

但从熊彼特的观点看来，上海之所以能迅速的吸引大批外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目前中国的政治体制的结构。熊彼特认为，为了吸引财货并

获得市场的发展，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就是“生产”，所谓生产，就是结合各种人力与物力，来产生新的财货。然而在生产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上海看到如下现象：在封锁经济（社会主义共同体经济）中，政府机关支配着生产策略，以达到足够的资本来发展，将旧的经济生产型态转换到新的经济生产型态时，这个转换的过程会产生相关的问题，例如结构性失业、都市规划等。由熊彼得来看，上海之所以能融通如此大量的资金，是不能单单从国民经济的储蓄来衡量的。在大陆的政治体制下，政府就像是一个超大型的独占企业和大地主，它将所得到的独占利益和地租收入作为信用的基础和资金的融通，这样极权又集钱的环境，促使上海在短短的十年间窜升至世界经济的重镇。

(三) 目前的现象

熊彼特也认为，当一个城市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一定会有所谓企业或是企业者产生的现象。如果说将之前我们提到的“生产新结合的实行”、“因应社会的型态的命令力或信用”再加上现在的“企业、企业者”，综合三者，可称为经济发展原有的根本现象。而之前我们提到上海的经济发展，也正是代表此一根本现象的最佳例子。虽然熊彼特对于企业和企业者的解释及讨论相当的多，但以上海为例，我们可以了解到所谓共同经济的指导者和私有经济的指导者的不同。就企业者的职能来说，就如同在原始游牧民族的酋长或在共产社会的中央机关。在中国政府领导下，上海的经济能够蓬勃的发展，让企业和投资者有动机去投资，让资金去能自由的流动，世界也深刻体认到中国计划经济的发展实力。

熊彼特的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观点与上海崛起

为何上海会如此的充满生气——其经济发展甚至大幅超越在台北？为何作为资本主义代表的台北，没法像社会主义代表的上海一样，拥有强大的发展力呢？我们来看看熊彼特的分析：

熊彼特对现代工业社会的了解得马克思(Karl·Marx)和韦伯(Max·Weber)之助甚多。熊彼特同意工业资本主义会无止境、动态地扩张；也同意大企业将会主导产、销；更重要的是他也同意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将会吞噬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本身的内在矛盾。西方资本主义最后一定会被某种型式的社会主义所取代。在熊彼特看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精神是资源的理性规划，校正市场自由竞争造成的偏差，亦即社会主义是指一种制度性的模式使中央得以控制整个生产体系。因而，熊彼特认为社会主义与民主政治并非必然冲突，只要我们将民主政治定义在政党政治、国会、内阁、首相等，那么混合经济（公营、私营经济并存）、福利国家都可能与民主政治相伴发生。这种民主的定义不但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

熊彼特与韦伯一样认为人们理性的生活态度对现代社会的产生有绝对的贡献。资本主义会加速人类理性化的过程。而理性化的生活态度是现代复杂社会必需的——这使得客观、中立、就事论事成为可能。由专家所领导的行政体系主导社会的发展与秩序乃为必然，“民主”将被局限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然而与韦伯不同的是：熊彼特认为人的理性、技术导向最后还是促成资本主义的质变——资本主义将一步一步走向社会主义。熊彼特的观点是，大企业的产生会促使理性化官僚机制扩张（包括公部门及私部门）。初期资本主义会强调市场自由竞争原则，但大企业、大财团等垄断性组织的形成以及两极分化、社会冲突等社会问题的产生，会诱导出理性官僚的管理模式和社会主义式的组织，最终走向中央集权。

因此，综合上述熊彼特两方面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其实社会主义并不比资本主义差，相反的，社会主义更能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上掌握更大的资源与效率。甚至可能会如同熊彼特所预测的，资本主义终将走上社会主义。

在梳理了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

观点后，我试图解答本部分开篇提出的两个问题。相对台湾，上海从一而终的社会主义发展环境，为其规避市场自由竞争的弊端，高效调配资源提供了巨大的优势，这保证了上海“充满生气”的发展轨迹。对于发展力的问题，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台湾的资本主义环境决定了它终将走向社会主义，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上海会保持更强大的发展力，我们不得而知。

小结

拜读过许多跟经济学家熊彼特相关的书籍后，觉得他是一位相当矛盾、又十分有趣的人。他既是一个保守份子，同时亦是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仰慕者；既是资本主义批判者的最辛辣批判者，亦是资本主义的严厉批判者，一个同时具有那么多矛盾身份的经济学家，当越深入了解他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越来越不了解他，这角色就是那么的令人感到有意思的。

上海是如何成为中国的进出锁钥，如何成为世界的要镇，于我，也一直是一个迷人的问题。故而，本文从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出发，以经济分析角度来看上海的崛起，这使我对上海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但是，就上海是如何迅速取代广州，成为中国近代外贸和对外开放的中心城市这一问题，尚有来自地理位置、历史因素、政治立场、甚至经济发展等等多个视角的原因，对于这些，我们都需要做更进一步的研究。

上海一个繁华、浪漫的东方明珠，和台湾比较起来，我们不该沮丧气馁，缺乏信心，相反的，中国公共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更应该激励我们向中国见贤思齐。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经济发展理论

创新是资本积累、个人致富之源



(美) 熊彼特 著 | 孔修德 朱肇峰 姜善芳 编译

北京出版社



四年一觉香江梦：我在香港大学求学的日子

人物小传：

陈慧荣，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香港大学博士、上海市浦江学者，曾供职于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研究兴趣包括：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经济学、国家-农民关系、土地制度与发展、社会抗争与社会管理。

七年前，出于对学术的热爱，我辞去了上海市委的工作；又由于某些非学术的原因，我选择了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在港大四年，有些许点滴感悟，愿与各位同仁分享。

重新发现中国

香港是块风水宝地，难得的自由天堂。对于爱书之人，最美妙的刺激莫过于“雪夜闭门读禁书”。香港是没雪的，也犯不着闭门，但想象下，住在太平山半山腰豪宅式的研究生堂，与旁边的富豪们为邻，手捧心仪“禁书”，坐拥无敌海景，何尝不是快意人生？原来，自己虽然一路政治学科班出身、又做过公务员，但在对中国政治的认识上无知得可怕。幸运的是，冯平山中文图书馆的大批“禁书”和西文图书馆海量学术名著似乎专为我一人摆设，我充分利用博士生可以借读六十本书的“特权”，忙着在图书馆与宿舍之间来回搬书。（插一句，港大的英文藏书无与伦比，相比而言，交大的包玉刚图书馆只能算个自习室！）

在香港，我发现了一个“新”中国。

体验英式教育

港大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是英式的，不太注重授课，入学后很快就要准备选题做论文，一年半时就得提交 probationary report（类似开题报告），答辩委员会通过了才能成为博士候选人并开始写论文（香港中文等校有美式的资格考试）。英式体制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导师与学生密切互

动，一个月至少要见好几次，学生汇报读书和研究进展，导师及时给出指导意见。研究生们有一个公用办公室，每人一台书桌，其用意想必在鼓励互动与交流。很多导师希望自己的学生每天都泡在办公室，在自己眼皮底下忙碌着，而不是去中环和铜锣湾等地晃荡。

起初，我总觉得没有看够文献，不想轻易开题，无奈导师每周都催促进展，“不胜其烦”。我曾想，没有美国大学那样前两年修课和资格考试，直接闯入开题阶段，太过冒失。在美国拿 Ph.D. 的教授们对此心知肚明，但奖学金就给四年，容不得慢工出细活。英式体制对此的补救，恐怕在于导师与学生的频繁互动（大陆一个教授带十几个研究生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容易做到的）。这有点像手工业的师徒关系，师传言身教，倾囊相授，徒弟用心揣摩，以期学到独门秘笈。

窃以为，美式体制有了两年的修课、大量阅读和资格考试，能够夯实学生的学术功底，保证基本的培养质量，英式体制培养的学生差异性大，有的可能出类拔萃，也有的可能愧对头顶的博士帽。美式体制的长处在于结构性（structure）的塑造，英式体制的优点在于能动性（agency）的修炼。

即便如此，相比于大陆，香港的授课有着自身的优势。港大研究生院的两门必修课是 thesis writing 和 research ethics，其他选修课大都是方法论课程，我选修了初级计量和中级计量。我所在的社会科学学院要求必修一门社会研究方法，所在的系要求必修一门政治学研究方法和一门专题课程。由此可见，香港的教育虽然不注重授课，但很注重方法论的培训。这一点是大陆高校很欠缺的。

走进学术厨房

学术专著或论文,是学者做出来的美味佳肴,仅仅学会品尝是不够的,要做一流的学问,就要走进学术的厨房,看看一流学者是怎么烹饪的,看他们怎么取材、怎么配料、怎么掌握火候、怎么包装。学人以鱼,不如学人以渔。

我跟香港中文大学的朋友,组建了一个 Idea Club,大家有不同学科背景,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等,每两周邀请不同学科的助理教授以吃饭的方式跟我们分享治学经历(如读博士期间如何克服挫折、如何选题、如何与导师相处、如何发表、如何求职等),当然也少不了八卦。请助理教授有几个好处,一是相对好请些,他们不要大牌,更重要的是他们才是站在学术前沿、最具创造力的学者。香港较高的奖学金让我们觉得比现在做老师更富有,不必担心以 AA 制的方式请老师吃饭会穷困潦倒。

教学相长

拿了香港政府的高额奖学金,自然要干活。我们每年都得做助教(teaching assistant)。主讲教授给本科生上完 lecture 之后即可拍屁股走人,其他事情都归助教管。助教的主要任务是把一个班分成 15 人以内的讨论小组(tutorial group),引导讨论,激发思考,记录学生表现,课前课后安排答疑,还要改试卷或者判论文。学生可以不听 lecture,但必须参加讨论小组,两次无故缺席,铁定不及格。学生上讨论课前必须阅读几十页到上百页的英文材料,带着问题参加讨论。阅读加讨论才是学习的核心。现在流行的哈佛和 MIT 公开课,其实只是相当于 lecture,只是学习的一小部分,甚至是次要的部分。如果以为国外学生就那么学习的,那就大错特错!买张盗版光盘,听听哈佛公开课,还是比不上哈佛毕业生,原因就在这。

就唠叨这么多吧。“香江梦”是做完了,现在开始做“中国梦”。

Many thanks for your time!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生难忘的事

人物小传：

赵鹏飞，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从上海乘四个小时飞机到鄂尔多斯，简单吃了一碗羊肉面，穿过一片黑暗摸到宿舍，因为旅途劳顿沉沉睡去。当时的我们没有想到，这一天，2012年8月15日，作为我们这段最难忘经历的开始，会被永远铭记。

第一次上课，差一点被孩子们的热情吓到。教室里簇拥过来的学生七嘴八舌地问着我们的名字，年龄，家乡。他们质朴、纯洁、可爱，让我们如沐春风。

第一次组织学校活动，原以为有着丰富学生工作经历的我们会驾轻就熟。但出乎意料的是，青春期的孩子们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从头开始，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但同时乐在其中。

还有第一次吃烩菜，第一次遭遇沙尘暴，第一次住有暖气的屋子。有太多的第一次都在这里，这里是远方，这里也是家乡。

牢记本职工作，投身一线教学

到达服务地后，我和支教队员们始终牢记本职工作，主动向学校申请参与教育教学，坚持在教学第一线。这届支教团中，有咱们国务学院的3位同学，我担任了伊金霍洛旗第三小学五年级六班的班主任，语文教师；江厚佳担任伊旗四中183，184班思想政治课教师；陈龙担任伊旗四中两个年级，6个班的信息技术课教师。

上海交通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9名支教队员在一年的时间里，身兼多个年级、多个班级、多门课程的教学工作，虽然不是师范院校出身，但我们坚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进步，不断积累经验，不断摸索提升，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教师。通过向老教师拜师学艺，增强对当地文化的融入和教学方法的学习；通过参加教研组的公开课、示范课等活动，听课评课，提高对讲



台的驾驭能力和课堂教学的质量……

我们还专门针对家庭条件困难学生进行义务辅导,将关心关爱落到实处,支教团办公室成了学生们的第二课堂。支教团还通过“七彩小屋”、“共青团周末剧场”等平台,引进体验式培训等全新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在参与中学习,在互动中收获,全面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在支教团老师们的积极努力下,任教班级的学生学习积极性空前高涨,学习成绩不断提高。其中,江厚佳任教的伊旗四中184班思想政治课平均成绩,在年级组11个班会考中,由原先倒数第二名变为正数第二名,受到老师、家长、学生的一致好评。

协助学校管理, 活跃校园文化

支教团老师们积极参与当地学校学生管理和校园文化建设,将在交大所积累的丰富的共青团、学生会工作经验应用到服务学校学生工作中。

在新街小学校园开办红领巾广播站,举办道德讲堂,建设爱心书屋、乡村少年宫;在伊旗四中组建校学生会、校志愿者服务队,创办校报《尚学》、校刊《新星》,开办毕业班励志讲座;在伊旗三小开展古诗文诵读大赛,举办文艺汇演等,通过活动育人的方式,帮助西部学生开拓视野,提升素质。

其中,在伊旗四中的支教队员,组建了新一届

校学生会,带领他们开展校园文化艺术节、红歌大赛、学习方法讲座、体验式培训等活动,并创办红十字急救培训、伊旗文明志愿者等公益项目,活动范围覆盖到全校学生,极大的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促进了校园文化氛围的形成。

参与学校建设, 助力全面发展

支教队员还主动发挥个人特长,在学校建设的各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内容包括:校园网络建设与维护,教师计算机辅导,针对学习方法、成功之路、人生理想、中考辅导等方面的系列报告会,校园规划,宣传工作等方面。

服务学校的校长用“雪中送炭”来形容支教团队员的加入,志愿者在服务地都被委以重任,多人被聘为校长助理和教导主任助理等职。

竭力爱心助贫, 关注学生发展

随着我校研究生支教团工作经验的积累,支教团在坚持做好教学育人这一基本工作的同时,针对服务地的具体情况积极开展扶贫接力工作,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地方团委支持下,支教团联系资源为农民工子弟新建了一座“七彩小屋”,并联系了浙江省舟山市电力局、交大爱心屋等校友资源,为服务地募集了90多箱近5吨的过冬衣物、书籍文具等;还与特困家庭开展“一对一”爱心捐助,受到地





方政府、家长学校的一致好评。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和转载。

支教团还筛选出一部分特困家庭，定期进行家访，为他们送上学习文具和生活用品，及时向学校反馈他们的学习生活状况，以实际行动践行志愿者精神。

参与大型赛事，展现交大风采

支教团队员们还积极参与地方大型活动的筹办工作，先后服务于鄂尔多斯国际那达慕大会、伊金霍洛旗国际马拉松赛等大型赛事，展现了交大志愿者的风采。

2012年到2013年，上海交通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在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的多个领域都留下了自己的身影，他们的工作受到服务地各级党政领导和家校师生的高度认可，团中央官方微博、服务地党报、新闻媒体，多次对支教团活动进行转载报道，被鄂尔多斯市授予“五四青年集体”

荣誉称号（共五家单位获奖），这是鄂尔多斯市将此荣誉第一次授予非本地单位。

我们秉承母校“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的校训，发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在一年时间里尽己所能，扎根基层，服务西部。

队员们这样评价自己这难忘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无法谈及自己做了什么奉献，有的只是这一年宝贵的人生经历”。张爱玲说过：“对于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的确，在这样一个年纪，人的每一次亲密接触、每一次感悟成长、每一次心情激荡、每一次泪水与感伤，都是那么新鲜，那么真切。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生活，被孩子热情的称呼一声“老师”，在课堂上上一节自己满意的课程，看到孩子们实实在在地进步。这些经历，这些记忆，是在这一年支教生活中最让我们珍视的。感谢这一年，让我们拥有这样一个不一样人生经历的机会，让我们能在这一年不长的时间里，做一件一生难忘的事。

立学先立德，立行先立身

人物小传：

秦川中，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09 级本科生。2010 年度上海交通大学三好学生十大标兵、自强自立先进个人、曾宪梓奖励计划优秀标兵、校三好学生、校优秀共青团员、国家奖学金、植物医生奖学金获得者，为筹建学院图书室捐出全额奖学金并以年级第一的优异成绩获得直升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资格。

立学先立德

做好科研的首要根基是“立德”，所谓“立学先立德”指的是：作为一名研究者，应遵守学术规范，恪守为人准则，牢守道德底线，杜绝一切有违学术道德的行为，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始终对科学精神怀有敬畏之情。作为一名刚接触学术研究不久的年轻人来说，我深知自己在学术探索的道路上会跌倒受挫，但在不断跌倒、不断爬起的过程中，我不断提醒自己要保持理智、清醒的头脑，秉持淡然、豁达的心境，冷静面对每一份收获和每一次挫折。

立行先立身

学术科研之路充满荆棘，唯有厚积薄发才能真正得出有价值、有意义的学术成果，从而为促进社会发展尽绵薄之力。本科期间，我多次参与学院老师的课题项目，并从中历练和积淀自己的学术能力，想要追求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就应当从学习态度和知识体系两方面同时狠下决心、狠下功夫。

在学习态度上狠下决心

我始终坚信，只要积极付出别人不愿付出的精力，就会有收获成功的一天。印象最深刻的是组织行为学这门课，我们小组的汇报成果和志愿者服务动机相关。在经过小组分工后，我花了一周的时间自学了课时为一个学期的统计学，并在最后报告中实现第一次应用并得到了老师的认可。关于统计学、统计软件的使用也为我打下了我们

这届少有人走的“定量”道路的基础，这对我的课程作业、毕业设计以及去清华时的参赛论文都有重要贡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仅仅是一门课程的作业，只要态度足够积极端正，就可以获得长远的收益。

在知识体系上狠下功夫

每个学院的课程体系设计都有各自的特征性和局限性，那就需要通过交叉课程学习来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学习第二专业是一个良好途径，它可以使你掌握另一门技能，拓宽知识面，弥补自己的知识缺漏。我将华师大的应用心理学作为自己的第二专业，三年 66 学分的学习让我除了自己本专业之外，基本具备了应用心理学的知识体系，收获颇丰。除此之外，考虑到公共管理的话语体系在很多方面和经济学相对接，计量经济学是经济学领域的基础课程，因而建议学有余力的同学尝试旁听安泰经管学院的《计量经济学》和《运筹学》这两门课，这将有利于拓宽学术视野，锻炼学术思维能力。





趁年轻，多出去走走

人物小传：

金帝，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 2011 级本科生。曾赴印度参加志愿活动、赴美国参加中美杰出青年培训项目、香港大学 2013 年秋季交换生、上海交大模拟联合国协会执行主席，获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三等奖、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共青团员。

支教于印度，在金砖古国起航

大一暑假，我赴印度斋普尔市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社会实践，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去了当地的非政府组织教贫民窟的小孩子们英语，这是我在大学期间最珍贵的经历之一，也成为了我在大学期间“向外跑”的起点。

SAKSHAM 是斋普尔市一家致力于使贫民窟的小孩获得最基础教育的非政府组织，也是我在印度期间开展志愿教学工作的场所。在教小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孩子们英语基础大庭相径，有的可以和我们自如交流，而有的甚至连字母顺序都弄不明白。为了更好地达到效果，我们每人会选择两三个英语水平相近的孩子进行因材施教。他们学得都很认真，看到他们的努力，我们都十分欣慰。

我们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教授英语，还是要向他们带去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怀与问候：他们并没有被这个社会所抛弃，无论什么时候都会有人关注他们，竭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为他们更好的明天做出贡献。

游历于美国，在大洋彼岸成长

大二暑假，我通过学院参加了由中国华侨公益基金会、上海华侨基金会和美国国际领袖基金会共同举办的中美杰出青年培训项目。为期两周的活动可谓是包罗万象，我们走访了纽约、华盛顿、波士顿这三座城市重要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机构，多次与来自美国社会政商界主流人士交流，期间还穿插了许多领导力培训。

这次旅途最难忘的事情就是能够参观联合国





总部。作为上一任交大模拟联合国协会的执行主席、一个模联人，我最向往的便是有朝一日能够去真正的联合国看一看。这次我不仅参观了联合国总部，而且还参加了联合国官员专门为我们一行人准备的关于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专题的讲座，可谓是收获满满。

在波士顿，我们有幸聆听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 Kelman 教授的讲座。在讲座结束之后的提问环节，有同学问及肯尼迪学院招收中国大陆学生的要求。Kelman 教授恰巧是下届招生委员会的成员，他提到肯尼迪学院一般只接受北大、清华、复旦和浙大学生的申请，其他大学不作考虑。我听后立即举手示意，起身向他介绍了交大近年来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教授这才解释交大在其考虑范畴内，但据他所知只是尚未有学生申请该学院，并就此向我道歉。我觉得这是本次美国之行自己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于我而言，这次经历所带给我最重要的一点是让我明确了未来几年的规划，让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想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

求学于香港，在东方之珠沉淀

听过无数学长学姐提及学期交换是大学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而目前我在港大已有一个半月

的生活经历切切实实地印证了这句话。

我在港大一共选了四门课，分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自由主义与其限制、当代社会中的批判性思维以及市场营销原理。课程数量看似不多，但实则这些课程的阅读量非常大，而且每门课都会再设讨论课，每次由专职助教带领十位左右同学讨论，讨论的内容就是需要阅读的材料。阅读材料的质量很高，且有不少难度，加之又是英文资料，所以我在图书馆度过了不少刻苦钻研的艰辛时光。但是，所收获的往往是和所付出的成正比。

在享有“美食天堂”、“东方之珠”美誉的香港，我也经常会外出游玩、增长见识。游览香港近十个博物馆，了解它与众不同的历史文化。周末与朋友成群结队，乘个船去南丫岛、大屿山或是澳门，领略祖国各地的大好河山。

执笔至此，暮然回首，发现自己在大学到过不少地方。作为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学生，身体和灵魂应同时也在路上，我们既要通过阅读拓宽知识面，也应通过旅行培养国际化视野。在旅途中，我们应常怀一颗好奇心去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色。多游历、多观察、多思考会使自己站得更高、走得更远、想得更深。

趁年轻，多出去走走，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政治学领域前沿梳理

1. 内战中的恐怖主义

Terrorism in the Context of Civil War

作者:

Jessica A. Stanto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文献出处: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期数:

Volume75, Issue04, October 2013

摘要:

尽管学者们投入了大量精力来研究跨国恐怖主义运动,但事实上恐怖主义更为广泛地发生在国家内部,尤其是在内战中反叛组织所实施的国内恐怖主义。本文通过考察大量内战过程中所发生的恐怖主义,来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为何一些反叛组织会使用恐怖主义,而另外一些反叛组织不使用恐怖主义?实际上,反叛组织会做出策略性的计算,他们会评估他们的对手即政府部门,

以及那些支持他们的市民们面对恐怖主义的反应。那些挑战民主政府的反叛团体更有可能使用恐怖主义,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对手,即政府部门,对平民损失(civilian losses)更加敏感,因而面对反叛团体的暴力会做出让步。反叛团体同时也会考虑使用暴力的成本,这取决于那些支持反叛集团的平民的特征。如果反叛团体有着广泛的民众支持,他们就会选择较低的民众伤害的目标来实施恐怖主义。作者通过检验1989年到2010年所发生的内战中的恐怖主义数据,验证和支持了上述结论。

2. 谁更愚蠢:经济政策还是对外政策?——外部危机对领导者民众支持的影响

Is It the Economy or Foreign Policy, Stupid? The Impact of Foreign Crises on Leader Support

作者:

Jaroslav Tir(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Shane P. Singh(University of Georgia)

文献出处:

Comparative Politics

期数:

Volume 46, Number 1, October 2013

摘要:许多研究民意支持的文献都认为领导人的民意支持取决于国家经济绩效。然而,根据转移视线战争理论,外部危机的爆发和卷入可以帮助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领导者提升他的民意支持。本文利用CSES Module II调查数据(这一数据覆盖了2001年至2006年间26个国家的数据),从比较的视角出发,考察国家卷入外部危机和领导人民意支持率之间的关系。多层次分析显示:卷入外部危机使得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外事务上,增加了对领导人的支持,同时也消除了失业的负面影响。尽管数据显示被雇佣的和失业的个

人对危机的反应几乎一致,但对于那些关心国家对外事务的民众来说,国家卷入危机时,他们对领导者的支持比其他民众要低得多。摘要:许多研究民意支持的文献都认为领导人的民意支持取决于国家经济绩效。然而,根据转移视线战争理论,外部危机的爆发和卷入可以帮助一个不太受欢迎的领导者提升他的民意支持。本文利用CSES Module II调查数据(这一数据覆盖了2001年至2006年间26个国家的数据),从比较的视角出发,考察国家卷入外部危机和领导人民意支持率之间的关系。多层次分析显示:卷入外部危机使得民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对外事务上,增加了对领导人的支持,同时也消除了失业的负面影响。尽管数据显示被雇佣的和失业的个人对危机的反应几乎一致,但对于那些关心国家对外事务的民众来说,国家卷入危机时,他们对领导者的支持比其他民众要低得多。

3. 缺乏信息还是主动容忍？——选民何时会支持腐败的政治家？

Lacking Information or Condoning Corruption: When Will Voters Support Corrupt Politicians?

作者:

Matthew S. Winter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Rebecca Weitz-Shapiro (Brown University)

文献出处:

Comparative Politics

期数:

Volume 45, Number 4, July 2013

摘要:

为什么民众愿意给那些腐败的政治家投票？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选民对政治家的腐败缺乏了

解信息的途径；另一方面，可能是选民明知其腐败，但由于这些政治家当政期间政绩卓越，给选民提供了大量公共物品。在巴西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无论政绩如何，绝大多数选民表示必须严惩腐败的政治家。然而高收入的选民则对这种全面打击腐败的态度提出异议。相较于普通民众，他们对腐败的信息并没有如此负面的反应，但对于政治家执政能力的信息反应更强烈。从而可以得出如下观点：特定的、可信的和可接触到的信息将导致大多数选民在投票时会选择惩罚腐败的政治家。

4. 压制亲属：通过社会关系瓦解抗议者

Relational Repression in China: Using Social Ties to Demobilize Protesters

作者:

Yanhua De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Kevin J. O'Bri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文献出处:

The China Quarterly

期数:

Volume 215, September 2013

摘要:

中国地方官员们频繁地通过威胁抗议者亲属来达到遣散、驱赶抗议者。当群体事件发生时，地方官员们就会去调查参与者的社会关系，找到那些有意愿去阻止抗议者的亲属，同时成立一个由这些亲属组成的工作组来给那些抗议者们做思想工作。工作组的成员往往会用他们的个人影响力来劝说他们那些参与抗议的亲属、朋友和同乡，使他们放弃抗争。如果工作组的成员没有完成任

务，那他们将会受到惩罚，惩罚的形式包括停发工资、撤职和被起诉。这种对亲属的压制有时是有效的。当地方政府对工作组成员有着巨大的控制力，同时工作组成员与抗议者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那么对亲属的压制将有助于瓦解抗议者的行动，从而阻止群体性行动。即使对亲属的压制不能完全终结抗议行为，但至少能够为缓和紧张气氛提供协商渠道，从而限制抗议者的势力和影响范围。但在2005年浙江某地的环保抗议事件中，由于做思想工作的亲属意识到自己对抗议者的劝说无效，以及他们预期到与其他亲属相比较，即使劝说失败，也不会受到较大惩罚，因而在这次事件中，亲属压制的方式并没有发挥有效作用。在中国，亲属压制这一方式展示了社会关系是如何瓦解或动员抗争，在此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力量结合为国家服务。



5. 战后和平条约的消失

The Demise of Peace Treaties in Interstate War

作者:

Tanisha M. Fazal(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文献出处: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期数:

Volume 67, Issue 04, October 2013

摘要:

战后所签订的和平条约内容都已成为国际政治的行为规范。然而,大约从1950年开始,战后签署的正式和平条约的数量却显著下降。究其原因,本文认为随着现代战争法的发展,签订和平条约的成本显著上升。本文分析一组原始数据后发现:当今国家倾向于避免承认国家处于战争和风险状态,因为承认国家处于战争和风险状态容易使国家领导人和士兵因破坏战争法而受到惩罚。

6. 有组织的叛乱:重新思考战争中的高风险动员和社会网络

Organizing Rebellion: Rethinking High-Risk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 in War

作者:

Sarah Elizabeth Parkins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文献出处: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期数:

Volume 107, Issue 03, August 2013

摘要:

关于武装动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谁参与反叛以及为何参与反叛等问题上,这些研究忽视了对参与时间和类型的分析。叛乱所获的支持和后勤配置往往对武装冲突的持续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学者们在以往研究并没有关注军事组织中这一类角色,或者说以往的研究忽视了军事组织中军人、战士和雇员这类组织人员结构、过程和他们的活动。现存的理论混淆了反叛组织中的动员参与和前线战斗。本文认为,要理解战时动员和军事组织的弹性,学者们必须将战斗者们放在他们所在的组织和社会背景中考察。通过追踪1980年代黎巴嫩出现的以妇女为主要力量的秘密供应链、金融和信息网络,本文表明了动员路径和组织部门往往诞生于正式组织和普通社会网络的重合地带。同时,通过案例分析,本文阐述了社会结构、军事组织和持续叛乱之间的微妙关系。

公共管理领域前沿梳理

1. 绩效管理在公共和私人部门中的影响

The Impact o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Public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作者:

Ulrik Hvidman(Aarhus University)

Simon Calmar Andersen(The Danish National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文献出处: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Advance Access

期数:

Volume 23, Issue 4, October 2013

摘要:

近期的理论研究进程发现:管理行为对公共组织和私人组织的成果和产出有不同的影响。这个结论对于公共组织广泛引入私人部门管理工具(如绩效管理)十分重要。本文考察了绩效管理如何影响其他相似的公共和私人组织的绩效成果,研究显示:阻碍绩效管理发挥作用的要素同公共组织的组织特征相类似,因而可以假定:相较于私人组织,绩效管理在公共组织中的作用发挥程度更低。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丹麦公立和私立学校的数据以及学生考试成绩的数据,本研究证实了这一假定,该结论对跨部门组织行为的交互具有重要启发。

2. 公共部门中的组织目标模糊和工作满意度

Organizational Goal Ambiguity and Job Satisfaction in the Public Sector

作者:

Chan Su Jung(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文献出处: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Advance Access

期数:

Volume 23, Issue 4, October 2013

摘要:

鉴于公共部门目标模糊具有理论和实践重要性,众多学者对该议题展开了研究。本研究旨在更深入理解组织目标模糊的内涵,并就公共部门工作满意度这一问题形成更为动态、全面的分析模型。本研究测量了最近发展的组织目标模糊的维度,包括三项客观测量和一项主观测量,本研究运用项目评估评分工具来测量对象模糊,时间轴模糊和优先度模糊这三类客观维度,运用功绩原则调查(2005)数据来测量任务理解模糊这一主观维度。随后,本研究在控制统计意义上显著相关变量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开展了单因素工作满意度测量,这些控制变量包括内、外部激励因素和组织结构特征。广义线性模型拟合的结果显示:任务理解模糊、对象模糊、时间轴模糊和优先度模糊都对政府雇员工作满意度具有负面影响。该结论对改善目标模糊和改进工作满意度理论具有积极作用,也将为提升公共组织雇员满意度提供建议路径。



3. 透明度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一个跨国界的比较实验研究

The Effect of Transparency on Trust in Government: A Cross-National Comparative Experiment

作者：

Stephan Grimmelikhuijsen(Utrecht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Gregory Porumbescu(Myongji University, South Korea)

Boram Hong(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Tobin Im(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South Korea)

文献出处：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

Volume 73, Issue 4, July | August 2013

摘要：

透明度被认为是值得信赖的政府的重要价值。但目前关于透明度对公民信任的研究中忽视了“国家文化”这一因素的作用。本研究以荷兰和韩国为例，通过两组相似实验的比较，分析了不同国家中透明度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研究者假定：透明度对公信力之所以能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是由于国家之间拥有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包括权力距离，长、短期发展方向。结果发现两个国家呈现出相似的影响模式。即透明度对政府公信力有削弱甚至有时负面的效果，但在韩国的负面效果更加明显。透明度影响的程度差异表明国家文化价值观在人们感知和理解政府透明度中发挥重要作用。

4. 如何激励员工适应变革？公共服务动机在员工面对组织变革中的作用

Motivated to Adapt? The Role of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 as Employees Face Organizational Change

作者：

Bradley E. Wright(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Robert K. Christensen(University of Georgia)

Kimberley Roussin Isett(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文献出处：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期数：

Volume 73, Issue 4, July | August 2013

摘要：

关注组织变革的研究者一直以来强调工作环境在员工接受变革中的作用。但是，公共管理文献中很少探讨有关员工价值观，尤其是公共服务动机(PSM)，对于员工接受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员工 PSM 和组织变革努力之间的正相关性，本研究旨在探索解释这组变量间关系的机制，进而拓展这方面研究。通过对正在经历劳动力重组和削减的城市里的员工的调查，本研究发现在 PSM 中“自我牺牲”这一单项得分更高的员工支持组织变革的可能性更高。本研究认为：PSM 得分更高的员工之所以支持变革，与其说是因为他们促进公共服务的潜能更大，不如说是因为他们抵触对自己不利的组织变革的可能性更小。

国务院 2013 年度上半年科研成果汇总 (部分)

2013 年上半年发表 SSCI 论文

姓名	类别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
钟 杨	SSCI	Between God and Caesar: The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Valu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60, No. 3, May/June 2013
钟 杨	SSCI	Regime Support in Urban China	Asian Survey Vol. 53, No. 2, March/April 2013

2013 年上半年立项纵向课题

负责人	课题名称	项目类别
翟 新	战后日本对华外交档案的整理研究与翻译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赵大海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财政投入机制与政策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彭 勃	重大公共政策后评估方法和机制研究	上海市发展改革决策咨询课题
陈 拯	中国参与国际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塑造的对策研究	上海市社科规划青年课题
王 郁	基于跨部门流程协同的城市开发规制综合调控机制研究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 (2014 年度)
郑 华	新兴国家公共外交发展路径研究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 (2014 年度)
左亚娜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视野下的台海安全战略博弈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上半年科研获奖

获奖人	获奖成果	获奖类别
魏 陆	上海增值税改革试点跟踪及成效研究	2013 年度上海市发展改革决策咨询研究成果三等奖

2013 年上半年教师荣誉

获奖人	获奖名称
胡 伟	“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获上海市软科学基地授牌
刘帮成	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
郑 华	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教师奖
章 伟	上海交通大学烛光奖
卢永彬	上海交通大学青年教师“全英语教学”竞赛一等奖
杨 姗	上海交通大学信息工作先进个人

速览

我校党建基地迎接市创新研究基地评估专家评估

2013年5月20日,受上海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社科规划办公室委托,我校“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迎来以原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尹继佐为组长的专家组的首次评估。我院院长、基地主任兼首席专家胡伟教授就基地成立运作三年来的工作情况作了全面汇报。我院曹友谊书记、彭勃副院长、林冈教授、陈映芳教授等出席评估会。

美国莫尔豪斯学院师生访问我院

2013年5月31日,美国莫尔豪斯学院(Morehouse College)2位教授和11位学生访问我院,我院副院长彭勃教授、外事秘书彭晶晶和2位国际硕士班的留学生在新建楼一楼多功能厅参加了此次见面。彭勃教授首先代表学院对莫尔豪斯学院的此次来访表示热烈欢迎,并为来访师生准备了一场精彩的《中国政府治理政策》为主题的讲座。随后,我院外事秘书兼国际硕士班项目经理彭晶晶向远道而来的美国简要介绍了“中国政治与经济”国际硕士班第一年的运作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规划,欢迎更多的美国学生到我院学习中国政治与经济。

南开大学朱光磊教授做客我校名家讲坛

2013年5月31日,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做客我校名家讲坛。我院钟扬教授主持了讲座,郑晓华、黄琪轩、陈慧荣等老师也参加了此次讲座。此次报告主题是“从身份到契约——中国阶层分化解析”,本次讲座由上海交通大学通识教育委员会、教务处和我院共同举办。

我院师生积极参与

2013年上海“比较政治经济学研讨会”

2013年6月1日-2日,上海“比较政治经济

学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本次会议由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我院联合举办。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国内学者主要有南开大学副校长朱光磊教授、我院院长胡伟教授、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傅军教授、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朱天飏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李连江教授、我院钟扬教授,上海交大学报刘晓荣编辑等也应邀参会。我院师生积极参与会议,提交并发表会议论文,并与各高校师生就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内的相关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与思考。

“中国周边关系与战略” 学术会议在我院顺利召开

2013年6月2日,“中国周边关系与战略”学术研讨会在徐汇校区新建楼3005会议室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由我院国际关系系李明明副教授主持,院党委书记曹友谊老师、上海国际关系学会秘书长金应忠教授致辞,二十余位校内外学者参加学术研讨。会议中各位学者踊跃发言,交流思想。会议结束时,俞正樑教授作总结发言,并激励青年学者要勇于学术探索,继续为中国的外交战略研究做贡献。

我院研究生徐汇区社会管理实践基地 召开项目鉴定会暨2013年课题实践启动仪式

2013年6月14日,上我院研究生徐汇区社会管理实践基地“和谐城区建设中区域战略发展研究”项目鉴定会暨2013年课题实践启动仪式在徐汇校区新建楼3005会议室隆重召开。上海市公务员局顾问、原市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处长、我校客座教授徐锦林,徐汇区人力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公务员局局长何爱兴,我院院长胡伟、党委书记曹友谊、副院长彭勃、章晓懿以及来自徐汇区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和交大的课题指导老师、参与课题实践的全体学生参加大会。会议由我院党委副书记谢玮主持。会上区校双方正式启动了2013



年5项课题，何爱兴局长与胡伟院长签定了2013年实践课题协议，并为区校双方的指导老师颁发聘书。据悉，2012年的联合实践课题中，“国有企业参与政府项目的融资机制研究”课题荣获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优秀项目奖，“上海市徐汇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诊疗服务现状的调查与分析”课题荣获第四届“知行杯”上海市大学生社会实践大赛三等奖。

我校台湾研究中心举办 全国首届台湾研究博士生论坛

2013年7月2日，首届全国台湾研究博士生论坛在我校徐汇校区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近20名以台湾研究为方向的博士生汇聚我院。全国台湾研究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周志怀研究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刘国深教授以及正在我校访学的中国文化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邵宗海教授、台湾成功大学社会科学院丁仁方教授和美国戴维逊学院任雪丽教授全程参加了这次论坛。论坛开幕式由我校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冈主持，胡伟院长致欢迎词，参加论坛的还有我院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钟杨、副教授吴清和左亚娜、卢永彬、尤怡文、黄宗昊等青年教师。

我院2013年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开营

2013年7月5日，我院迎来了陆续前来报到的夏令营学员。此次夏令营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985工程”、“211工程”等重点高校的260余名优秀本科生和硕士生踊跃报名。经过严格筛选，60余名才学兼备的学生参加了本次夏令营活动。7月6日上午，我院全国优秀大学生夏令营正式开营。胡伟院长、彭勃副院长、章伟博士参加了此次开营仪式。胡伟院长向前来参加夏令营的学员表示热烈的欢迎。7月7日下午，章晓懿副院长、陈映芳教授等20位老师组织了共计六场分组论文报告会。根据这两天的表现以及论文报告会的发言情况，老师们对营员们的专业素质、综合素质和外语水平做了综合考察，为2014年硕博研究生招生奠定了基础。



我院国是民意坊“问卷吧” 网站在线调研系统正式上线

2013年7月11日，我校召开2013年夏季学期全体思政教师、辅导员大会，会上校党委副书记朱健、我院党委书记曹友谊、学指委秘书长王伟明共同为“问卷吧”网站启动上线。“国是民意坊”是985三期学生全面成长成才体系建设之院系创新试验区的资助项目，“问卷吧”网站(survey.sjtu.edu.cn)在线调研系统支持Jaccount用户自助创建和管理调查问卷，支持面向学校特定用户的调查问卷(例如人人网、Jaccount用户、某一年毕业生等)，对校内师生免费提供服务，能够时时在线统计调查结果，灵活方便的管理用户调查数据，并且拥有具有专业知识背景的学生管理团队。

我院师生赴美国费城参加国际暑期工作坊

2013年7月12日，由我院与美国德克赛尔大

学 (Drexel University) 联合开展的首届国际暑期工作坊项目的第一阶段(中国国内项目)圆满落幕。7月13日,我校五位师生将回访美方院校,并互相关展学术交流活动。此次来华参加国际暑期工作坊的美国德克赛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师生共计4人,其中一名教授,三位研究生。我院赴美的师生团队由彭勃副院长,樊博副教授及我院的三位研究生组成,彭勃副院长任队长。此次国际暑期工作坊的主要活动内容包括:合作课程、实地考察与文化交流三部分内容。

胡伟院长率团访问台湾参加学术会议

2013年7月24日-29日,我院胡伟院长率团访问台湾,参加我院与新竹交通大学工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亚太区域暨城市治理论坛。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张军扩、北京市测绘设计研究院院长温宗勇、杭州市城市科学研究所所长阳作军、浙江大学景观艺术研究院院长朱仁民、我校城市社会研究中心主任陈映芳、上海浦东台湾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在为期一天的论坛中发表了论坛演讲或论文。我校特聘教授兼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林冈、我院讲师卢永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李杰研究员、上海市台办主任科员叶国召以及正好在台湾访问的潘天寿基金会执行副会长胡剑芬也参加了这一论坛。



我院社会实践团队

赴上海农村地区调研大学生村官发展状况

2013年7月29日始,由我院团委与我校公务员协会组建的“上海市大学生村官成长发展调研”社会实践队伍在前期大量准备下陆续赴上海市各区县进行了为期1个多月的实践调研。本项课题既是我校暑期大学生社会实践课题,又是我校公务员发展协会重点开展的专题调研项目。课题组通过各种渠道,以“滚雪球”的方式获得了近30名大学生村官的支持。截止目前,调研团队已前往奉贤、嘉定、浦东、松江等4个区县的连俊村、娄塘村、陆象村、北新村、伏虎村、曹王村、太平村、沙河村等农村地区进行了实地访谈和调研,获得了大学生村官成长发展的第一手资料。

我院举行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

2013年9月8日,我院2013级新生开学典礼在东中院1-300隆重举行,热烈欢迎跨入校门的本硕博新生。院长胡伟,党委书记曹友谊,副院长章晓懿、彭勃,党委副书记谢玮,院长助理JEAN-MARC F. BLANCHARD(白永辉),教师代表林冈、郭俊华、郑华、张录法、卢永彬以及新生年级辅导员出席典礼。新入学全体新生济济一堂聆听了开学第一堂课。典礼由党委副书记谢玮主持。



康奈尔大学卡赞斯坦教授与我院师生座谈

2013年9月13日，美国康奈尔大学彼得·卡赞斯坦教授受邀来访我院，在3005会议室与我院师生进行了一场座谈。此次座谈由我院院长助理白永辉教授主持。卡赞斯坦教授是国际比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领域的著名学者，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卡赞斯坦教授将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深入探讨了中国的“面子”、“关系”等问题。卡赞斯坦的发言激起了会场热烈的讨论，在座的老师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与此同时卡赞斯坦教授还通过举例，说明了理论模型在预测中的不足，以及对不确定性以及风险的预知方式和能力的忽视，针对这一问题，他与在座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整个座谈持续了近2个小时，白永辉教授对卡赞斯坦教授的讲座表达了谢意，希望双方能在学术上有更多的交流与合作。

胡伟院长领衔“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 获上海市软科学基地授牌

2013年10月11日，由我院院长胡伟教授领衔申报的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 - “上海市创新政策评估研究中心”，荣获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授牌。上海市科委巡视员徐美华、市科委发展计划处处长陈海鹏、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叶青教授等出席授牌仪式。会上，胡伟院长介绍了创新政策评估基地建设的目标、特色、团队与平台建设，以及未来五年的研究建设规划。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 青木昌彦教授来访我院作讲座

2013年10月22日下午，世界著名学者、国际经济学会(IEA)主席、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专家青木昌彦教授应邀来访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并为学院师生进行了一场深刻精彩的讲座。讲座由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主持，吸引了众多师生的参与，其中也不乏慕名而来的外校学者。青木昌彦教授是著名的“内部人控制”理论的提出者，又是长年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的比较制度理论大师，他曾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并于2005年当选为国际经济学会主席。

我院师生参加

第一届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

2013年9月8日-9日，第一届比较政治经济学国际学术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是中国比较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领域第一次举办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举办。会议邀请了两位前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康奈尔大学 Peter Katzenstein 教授、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 Margaret Levi 教授，同时还邀请了比较政治经济学领域著名学者哈佛大学 Robert Bates 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Peter Evans 教授、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 Peter Gourevitch 教授和瑞典著名经济学家斯德哥尔摩大学 Torsten Persson 教授。

会议中，我院黄琪轩老师、陈慧荣老师以及研究生蒋佶颖、姚炬积极参与发言讨论，并在会中宣读了由黄琪轩老师和研究生蒋佶颖合作完成的英文论文《脆弱的市场和技术进步：为何大英帝国会在19世纪后期衰落？》。会议结束环节，主办方还分别以“外国学者看中国”和“中国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未来”为主题设置了两场主题圆桌讨论。

国院风采

1. 张曙光教授
楚树龙教授
冯绍雷教授
齐聚国际关系名家讲坛
为我院师生做精彩报告



1

2

3

4



2.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
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
沈志华教授
做客焦点讲坛
作“友谊的代价——中朝关系的历史考察”
报告

3. 美国康奈尔大学
卡赞斯坦教授
做客名家讲坛
并与我院师生座谈



4.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
国际经济学会 (IEA) 主席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专家
青木昌彦教授
到我院讲学

